

上海律协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

2025 年 1 月

第 01 期

法律资讯



婚姻家事与财富传承



主任：吴卫义

主编：吴 琼

编委：（按姓氏拼音）

陈宏伟 陈雁

杜伟 方青

高明月 高兴

葛珊南 韩静

胡瑞平 刘创

刘琪 陆以洁

马赛男 钱元春

邵玉民 沈美娇

沈奇艳 王慧婷

吴琼 武鹏

徐巧月 燕晓凤

杨燕婷 叶盈盈

元玲慧 袁芳

张玮颖 赵宁宁

执行主编：陈雁

目录

媒体聚焦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新闻发布会
（来源：中国人民法院网） 1

2、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出台，解决这些疑难问题
（来源：央视新闻） 13

3、彰显保护婚姻家庭的国家意志
（来源：中国妇女报，记者：王春霞） 24

新规速递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31

2、民政部等 18 部门联合印发《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办法》
（来源：民政部门户网站、中国社会报） 39

裁判动态

1、涉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44

2、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51

案例评析

1、父母婚后购房出资纠纷案例评析：借款与赠与的法律边界审视
（来源：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江骋骏律师） 59

2、2024 年婚姻家庭法经典案例——律师代理 C 先生与 Z 女士离婚纠纷及婚
约彩礼纠纷案
（来源：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王舒畅律师） 64

➡ 业务研究

1、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法律适用中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为视角
（来源：《法律适用》2025 年第 1 期，作者：陈宜芳、王丹） 77

2、继父母子女关系中的若干实践问题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5 年第 1 期，作者：王丹） 105

3、家庭的双重角色及其法律界定：传统基础与当代阐释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 年第 1 期，作者：汪洋、刘冲） 130

➡ 媒体聚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新闻发布会

（来源：中国人民法院网）

时间：2025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10：30

地点：最高人民法院全媒体新闻发布厅

出席嘉宾：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 陈宜芳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吴景丽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 王丹

主持人：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

发布内容：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

[姬忠彪]：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出席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

[10:33:12]

[姬忠彪]：

家和万事兴，为正确贯彻实施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待，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本司法解

释，并选取了四个典型案例，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10:33:40]

[姬忠彪]:

我们邀请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和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王丹出席今天的发布会。[10:33:51]

[姬忠彪]:

首先请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陈宜芳庭长进行发布。[10:34:01]

[陈宜芳]:

各位记者朋友: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正确实施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引导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解释（二）》已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33 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10:34:23]

[陈宜芳]:

一、《解释（二）》的制定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婚姻家庭矛盾呈现出新特点，家事纠纷案件数量高位运行。近三年来，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每年大约 200 万件，占全部一审民事案件的 12 % 左右。其中，离婚纠纷案件每年大约 150 万件，占有所有家事案件的近 80%。离婚纠纷中，财产分割成为焦点。涉案标的额增大、财产类型多样化，婚姻家庭与财产领域问题交织，疑难复杂案件增多，法律适用标准亟待统一。[10:35:12]

[陈宜芳]:

民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清理涉婚姻家庭司法解释，并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随后即开展《解释（二）》的调研论证和起草工作。我们广泛征求了立法机关、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方对解释内容基本达成共识。为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我们还将解释内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间，共收到意见建议近 1 万份。我们逐一研究，充分吸收。相关反馈意见对完善司法解释内容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争议较大的问题，我们将继续总结审判实践经验，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进行裁判指导。[10:35:53]

[陈宜芳]:

二、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解释（二）》立足国情、社情、民情，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待。《解释（二）》共 23 条，坚持问题导向，力求务实管用，重点解决夫妻间给予房产、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以及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人民群众关心的审判实践疑难问题。重点介绍以下几个方面：[10:36:23]

[陈宜芳]：

（一）维护公序良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法典规定，禁止重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解释（二）》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细化：一是明确重婚绝对无效的立场。重婚违反了我国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是违法犯罪行为，法律坚决予以否定和打击。为此，《解释（二）》规定，即使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的，重婚的婚姻亦不能自以上情形发生时转为有效。二是明确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目的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无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不仅侵害了夫妻另一方的共同财产权，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解释（二）》明确规定该类行为无效，夫妻另一方诉请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0:36:47]

[陈宜芳]：

（二）平衡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与婚姻家庭团体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

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宪法第 49 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民法典将“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规定为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解释（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宪法、民法典上述规定，在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夫妻间给予房产等具体案件法律适用中，充分考虑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婚姻家庭现实状况以及相关出资和给予行为的目的性特征，不作“一刀切”规定，强调在以出资来源作为分割财产基础的前提下，要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公平公正处理。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强调家庭成员应当共同努力、互相关爱、互相帮助，既不能因短暂婚姻获得大额财产，也肯定对家庭付出的价值，增强婚姻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0:38:19]

[陈宜芳]：

（三）维护诚信原则，保障特殊群体利益

民法典第 7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针对有些夫妻意图通过离婚方式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不诚信行为，《解释（二）》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权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通过该规定平衡保护债权人与夫妻另一方和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对于离婚协议约定共同财产给予子女后一方反悔的，《解释（二）》规定，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

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另一方可以请求其继续履行或者赔偿损失；针对离婚协议约定不需要对方负担抚养费、又以未成年子女名义起诉主张抚养费的，《解释（二）》规定，离婚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如果子女确有实际需要，应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依法予以支持。

[10:40:06]

[陈宜芳]：

（四）平衡保护夫妻财产关系与市场交易安全

根据民法典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在无特别约定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个人从事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因此，需要平衡保护夫妻财产关系与市场交易安全。比如，《解释（二）》规定，夫妻一方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该规定表明：一方面不简单以婚姻家庭受特殊保护为由否定家庭之外基于市场交易的公司法等规则，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外部关系对家庭财产分配的影响，以免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10:41:49]

[陈宜芳]：

此外，《解释（二）》还对同居析产纠纷处理、继父母子女关系认定和解除、离婚经济补偿、离婚经济帮助等规则予以细化，平衡保

护各方利益，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10:43:14]

[陈宜芳]:

为帮助大家更直观、更形象地理解《解释（二）》相关条文内容，我们同时配发了四个典型案例。在案例一中，夫妻一方在结婚后将其婚前房产为另一方“加名”，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婚姻存续已十年，但给予方承担更多家庭开销，结合双方对家庭贡献等因素，判决房屋仍归给予方所有，但酌定对另一方合理补偿。在案例二中，一方父母将自己名下房产转移登记至夫妻双方名下，离婚时，人民法院在认定该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房款由一方父母出资、赠与目的及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未孕育共同子女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但酌定对另一方合理补偿。这两个案例既符合婚姻关系中夫妻财产制度，又保护了给予方的财产权益。案例三是人民法院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依法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组织对双方当事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并现场督促抢夺一方第一时间将子女送回，快速制止不法行为，尽量减少抢夺行为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伤害。案例四明确，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反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的行为无效，另一方请求第三人全部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总结审判实践经验，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法答网答疑、案例“入库”等方式加大对家事审判的指导力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10:43:40]

[陈宜芳]:

家和万事兴。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是每个人的期盼，也需要我们共同维护。各级人民法院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努力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裁判，做实定分止争，引导家庭成员敬老爱幼、互相帮助，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保障。[10:46:01]

[姬忠彪]:

感谢陈庭长的发布。下面，欢迎各位记者提问，提问前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10:46:33]

[中国青年报记者]:

为规制“通过离婚方式意图逃债”行为，此次司法解释是如何规定的呢？[10:47:07]

[吴景丽]:

民法典第 7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在夫妻以一方名义对外负债的情况下，有的夫妻意图通过离婚方式“金蝉脱壳”，将全部或者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给未负债一方，使负债方的偿债能力降低，损害债权人利益。这种行为是不诚信的，法律坚决予以否定。《解释（二）》明确，如果债务人通过离婚恶意逃债，债权人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538 条或者第 539 条关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规定，请求撤销离婚协议中的相关财产分割条款，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要特别说明的是，离婚协议中夫妻双方的财产分割往往会考虑子

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并非一定均等分割。不能简单以只要不均等分割就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撤销离婚协议，需要考虑婚姻家庭的特殊性，严格把握撤销标准。司法解释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基础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在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避免损害夫妻另一方和未成年子女利益。[10:47:29]

[中国妇女报记者]：

实践中，夫妻双方分居期间或离婚后，一方有采用激烈的、不合理的手段阻止另一方探望孩子，甚至抢夺、隐匿孩子情形，司法解释有哪些回应？[10:49:34]

[王丹]：

民法典第 1058 条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權利。《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24 条也明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權利，更为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在审理案件中，我们发现，夫妻关系破裂后，彼此之间敌对、赌气，有时会失去理智，出现“抢娃”大战。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往往更多关注自己的情感发泄和经济利益得失，而忽略了“角落里”的孩子。法律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应当作出否定性评价。基于此，《解释（二）》用三个条文对该行为予以规制：一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侵害禁令，及时快速制止不法行为；二是在没有离婚的

情况下，根据当事人请求，在监护权纠纷中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抚养事宜；三是在离婚纠纷中确定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直接抚养时，将该行为作为不利因素，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司法审判中，法官一般会通过家事调查、心理评估、走访等方式全面了解各种情况，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综合各种因素判断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直接抚养更为适宜，具体考量因素包括子女的个人意愿、年龄、性别、与双方的情感依赖程度、双方经济状况等。

我们要特别强调，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他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更有对父母的依赖和爱，不是可以随意争夺和处分的物品。孩子与父母双方的血缘亲情无法割断，孩子的成长既需要父爱，也需要母爱，任何单独的一方或者其他人都不可替代。婚姻破裂，孩子已失去完整的家，但我们可以努力做到让他们不再失去完整的爱。

[10:49:47]

[新华社记者]:

在我国，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现象较为普遍，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上述房产该如何分割？[10:52:48]

[陈宜芳]:

子女结婚时由父母出资购房既是我国传统上家庭财产代际传承的方式，也是父母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祝福和物质支持，同时承载着父母对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期盼，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子女离婚时，父母的希望落空，利益平衡被打破，纠纷也由此产生。《解释（二）》处理该类纠纷的基本原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精神为指导，落实民法典第 1062 条、1063 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范围的规定以及第 1087 条关于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在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同时，注重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肯定和鼓励双方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

根据民法典第 1062 条和第 1063 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除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以外，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基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特殊考量，如果婚姻关系解除，父母出资购房的行为基础丧失，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考虑个案情况予以平衡。根据民法典第 1087 条规定，夫妻离婚对分割共同财产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其中“财产的具体情况”应当包括出资来源情况。鉴于实际生活中出资来源的复杂性，司法解释区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和部分出资两大类情况分别予以规定：1. 针对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情况。《解释（二）》规定，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依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房屋不论是否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都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以保障出资父母一方的利益。但是，同时也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来确定是否需要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2. 针对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对房屋均有出资的情况，《解释（二）》规定，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依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时，因不同案件出资来源和各方出资比例不同，需要根据个案情况分别处理。比如，双方父母的出资比例为 2:8，如双方没有明确约定房产归属，具体分割时，一般可以判决房屋归 80%出资比例的一方，但是并非一定给另一方 20%的补偿，需要在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的基础上，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补偿比例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 20%。《解释（二）》引导大家在婚姻中更注重双方的共同努力和付出，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增强家庭认同感和婚姻凝聚力，既不能让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的一方伤心又伤财，也不能让婚姻成为获取不当利益的借口。[10:53:04]

[姬忠彪]:

感谢陈宜芳庭长、吴景丽副庭长和王丹法官的发布和解答，感谢各位记者的出席。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出台，解决这些疑难问题

（来源：央视新闻）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针对民法典实施以来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婚姻家庭纠纷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亟须解决的争议问题，进一步予以规范。重点解决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的归属、夫妻基于婚姻给予房产的认定、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同居财产分割、通过离婚恶意逃债等社会关注的审判实践疑难问题，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规则，定分止争。总台记者采访最高法相关负责人深入解读司法解释新规定。

【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 子女离婚时财产如何分割】

在我国，子女结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仅是家庭财产代际传承的方式，也是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祝福和物质支持。然而，当子女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父母出资购房的归属问题往往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最高法发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对此进行了规定。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除了赠与合同确定只归一方的以外，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双方可以通过协议分割共同财产，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情况作出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介绍，财产的出资来源应该是财产的具体情况的一种情形，也就是说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正常是一人一半，但是如果这个财产的来源都是来源于夫妻一方或者一方父母，在分割

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财产的来源情况，可能就不见得一人一半了。

司法解释区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和双方父母出资或一方父母部分出资两种情况，分别予以规定。

第一种情况：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解释规定，如果赠与合同约定只给予自己的子女，应当按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房屋不论是否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都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以保障出资父母一方的利益。但是，同时也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等事实，来确定是否需要对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例如，小明和小红结婚时，小明的父母为他们全额出资购买了一套房子，但没有明确约定房子只归小明所有，双方在共同生活五年后离婚。根据最新司法解释，小明和小红离婚后，法院在判决时会考虑小明父母的出资情况，将房子判给小明。同时，法院也会考虑小红在婚姻中的付出，如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有子女以及离婚过错等因素，决定对小红予以合理补偿。

第二种情况：双方父母对房屋均有出资或一方父母部分出资。因不同案件出资来源和各方出资比例不同，难以明确房屋归哪一方所有，需要根据个案情况分别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 陈宜芳：比如一方父母出资 20%，另一方父母出资 80%，原则上会判定房屋归出资 80% 那一方父母所有，但是给予另一方的补偿，那不一定就是 20%，要根据双方婚姻的情况、共同生活的情况、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对婚姻的过错情况

等因素来判断。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从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的原则，来确定给对方的补偿数额，这个数额可能会低于 20%，也可能会高于 20%，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这就需要法官全面地查明案件的事实，综合考量做出一个合法合理的判断。

法官表示，司法解释在确定父母出资购房归属问题时，注重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同时，也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王丹：原则上如果一方父母出全资的，保护出资人的利益，但是我们要根据婚姻家庭的特殊情况，要保护对于婚姻家庭付出的一方，尊重他付出的价值，也引导大家不要再关注加名、登记，这样可能会给婚姻埋下不和种子的行为。最终如果说万一双方的婚姻达不到长久的程度，在离婚的情况下，司法根据各方的出资情况，付出情况来综合考量，最终来平衡双方的利益，这样也引导大家更多地关注对家庭的付出，能够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同居生活期间取得的财产 双方如何分割】

近年来，因同居引发的财产纠纷逐渐增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但同居当事人的财产权利应得到法律保障。因此，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如何分配，仍需明确的法律规则来规范，此次司法解释对同居关系财产分割进行了规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办理结婚登记，双方具有婚姻关系，才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同居不同于婚姻，同居双方不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不适用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那么针对同居生活期间取得的财产根据什么规则分配呢？

首先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是按照“自己的财产归自己所有”的原则，比如说双方都有工资，各自的工资归各自所有。

然而，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双方可能会因共同出资购置财产、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等情况导致财产无法清晰区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如何分割呢？

司法解释规定，出资比例为首要考虑因素，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事实进行分割。

一是双方共同生活情况，比如说是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和双方对生活的付出情况。二是要考虑是否有子女，涉及到子女的抚养和以后抚养费用的负担。三是要考虑对共同出资期间获得的财产的贡献大小，比如说双方共同出资、投资经营，但主要是由另一方实际经营，那么在分割财产的时候也要考虑双方的贡献大小。

总之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妥善处理双方利益。

例如，小明和小红在同居生活期间，共同投资开设了一家店铺，小明出资 70%，小红出资 30%，在财产分割时，首先会考虑出资比例，但如果店铺的经营主要由小红负责，店铺增值部分的收益也主要得益于小红的努力，那么法院可能会适当提高小红所占的份额，以体现其对财产增值的贡献。在此也提醒大家，在同居期间，最好能提前就财产分配达成明确的书面协议，以避免日后产生纠纷。

【严厉规制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

实践中，双方分居或离婚诉讼期间以及离婚后，有的父母会采用激烈的手段阻止另一方探望孩子，甚至抢夺、隐匿孩子，针对这种行为，司法解释进行了回应。

最高法表示，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保护的權利，更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司法解释对该行为予以规制。

首先是快速制止不法行为，通过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行为禁令的方式，让孩子快速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第二就是在一方还不愿意离婚的情况下，我们在监护权纠纷案件中，明确法院可以判决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第三，在离婚诉讼中确定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直接抚养时，我们将存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这种情形作为对其不利的因素，优先考虑由另外一方抚养。

司法审判中，法官一般会通过家事调查、心理评估、走访等方式全面了解各种情况，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综合各种因素判断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直接抚养更为适宜。

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财产给子女的 不得随意撤销

离婚纠纷中，夫妻双方对大额共同财产尤其是唯一房产的分割难以达成一致时，折中的办法经常是将该财产给予共同子女。也有的当事人之所以同意离婚，正是因为对方同意将共同财产给予子女。但是离婚后，一方拒绝履行协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此，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规范。

司法解释明确，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意味着，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给子女的财产，一旦离婚协议生效，双方必须履行。

例如，小明和小红离婚时，双方约定将共同拥有的房子给予他们的孩子。离婚后，小明反悔，想要撤销这个约定，法院不会支持小明的诉求。

按照赠与合同的规则，就是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是有任意撤销权的，基于这种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赠与，它实际上是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分割的一个具体形式，所以不能任意撤销。

司法解释还规定，如果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以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法官介绍，比如说他把房子卖了，这个时候再让他继续履行房产就不可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替换成赔偿损失这样一个民事责任。

此外，实践中，存在当事人将财产给予子女后，发现子女非自己亲生的情况，对此，解释明确，一方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可以请求撤销该约定并重新分割相关的夫妻共同财产。

【规制“离婚逃债”行为 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实践中，有些夫妻以一方名义对外负债，为了逃避债务，便采取离婚的方式转移财产，给债权人带来了很大困扰。为了有效规制这种行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司法解释明确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离婚

协议中的相关财产处分条款。

例如，小明与小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小明名义向小王借款 50 万元。为了逃避债务，小明与小红协议离婚，并将家庭财产全部转移至小红名下，导致小王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

针对这类现象，司法解释明确，如果双方通过离婚恶意逃债，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离婚协议中的相关财产处分条款。

也就是说，小王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小明与小红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转移的条款，以保护自己的债权。

法官表示，在夫妻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况下，有的夫妻通过协商将财产转移给不负有债务的一方，就是通过这种金蝉脱壳的方式逃避债务。债权人如果有证据证明存在这种通过离婚协议逃债的情形，那么可以参照民法典的规定行使撤销权，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处分的条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此外，法官介绍，要特别说明的是，离婚协议中夫妻双方的财产分割往往会考虑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直接抚养、一方是否存在过错等因素，并非必须均等分割。因此，不能简单以财产分割不均等就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撤销离婚协议。需要考虑婚姻家庭的特殊性，严格把握撤销标准。

在判断债权人的撤销权应予支持的时候，也要考虑双方离婚的过错、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履行的情况，还有子女抚养的负担等情况综合作出判断。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不能损害离婚的夫妻一方的还有子女的合法权益。

【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 不因离婚或原配偶死亡转为有效】

我国民法典和刑法均对重婚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禁止和惩处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重婚的无效婚姻是否可以因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转为有效，仍存在争议。此次司法解释作出了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对重婚行为的打击力度。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即便提起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重婚的婚姻也不能从上述情形发生时转为有效。如果重婚中存在善意的一方，他（她）可以根据民法典规定，请求有过错的一方赔偿损害。

例如，小明和小红结婚后，小明又与小王重婚。后来，小红去世了，但是小明与小王的婚姻依然无效。如果小王结婚时并不知道小明已婚，小王可以要求小明赔偿损害。

法官表示，重婚不是个人的事情，它破坏了我国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所以我们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打击重婚。

【夫妻间给予房产行为 离婚时房产归属如何判定】

实践中，男女双方在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给予另一方，或者为另一方“加名”的情况比较普遍。然而离婚时，房产的分割往往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此次司法解释就夫妻间给予房产行为在离婚时如何分割，明确了不同情形下的处理规则。

司法解释对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区分尚未办理转移登记和已经办理转移登记两种情况，分别予以规定。

第一种情况：尚未办理转移登记的。司法解释规定：夫妻间约定给予房产的，离婚诉讼时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婚姻家庭实际情况，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也就是说给予方不能随意撤销该约定。

例如：小明和小红结婚时，小明约定将婚前购买的一套房产送给小红，但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离婚财产分割时，法院会考虑结婚时间的长短、是否孕育共同子女、离婚过错以及对家庭的贡献等因素进行判决。法官介绍，比如说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很长，比如 10 年、20 年，虽然没有办理转移登记，但是对接受一方来讲，他对家庭的付出是很多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接受一方基于给予方的约定，也可以主张房产归他，我们也可以判决房产归接受一方。但是如果说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比较短，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再判决房屋归接受一方，而是判决房屋归给予一方所有，可以考虑给接受一方一些补偿，这样能够达到双方利益的一个平衡。

第二种情况：已经办理转移登记的。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可以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根据婚姻家庭实际情况，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例如，小明和小红结婚后，小明将婚前购买的房子过户给小红。如果二人结婚多年，可以由小红保有该房产。但如果二人结婚时间很短，并且小明没有重大过错，法院会判决房子归小明所有，并让小明

给予小红合理补偿。

法官介绍，已经办理转移登记的，原则上要维护财产的一个既有的秩序，和保护接受方的合理预期和弘扬诚信价值，也就是说只要办了过户登记，我们是认为房屋是归接受一方的所有。但是也要调整一些特别不平衡的情况，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很短，比如说一年或者甚至有的案件中，房屋转移登记之后，不到一周就提起了离婚，这个时候如果给予方也没有什么重大过错，我们虽然办理了转移登记，还是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一方所有的，以明确对于因短暂婚姻获取大额财物这样一个行为的否定态度。

法官表示，人民法院在判决时会平衡各方利益，既不能让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的一方既伤心又伤财，也不能让婚姻成为获取不当利益的途径。

夫妻一方私自赠与“第三者”财产 另一方能否要求返还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无特别约定，夫妻双方的财产归共同所有，但当一方私自将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时，另一方是否能够要求返还呢？司法解释进行了规定。

最高法表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私自将婚内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不仅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更是一种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司法对此坚决予以否定和摒弃。为此，解释明确规定，夫妻另一方主张赠与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另一方有权要求返还财产。

例如，小明和小红是夫妻，小明背着小红给“第三者”小王送了 10 万块钱。小红发现后，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小明的赠与行为无效，并有权要求小王返还财产。

最高法法官表示，在无过错的配偶和破坏他人家庭的婚姻之外的第三者之间，要坚决地保护无过错配偶一方的权益，这是我们旗帜鲜明的一个原则。

有意见提出，实践中存在夫妻合谋以另一方名义要求返还的情况，这对存在严重过错的出轨一方没有起到惩罚的效果。为此，司法解释也专门增加了相应条款，明确：在夫妻关系内部，无过错的另一方可以在不离婚的情况下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因此导致离婚的，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少分或不分。

也就是说财产返还给夫妻双方之后，在夫妻内部分割的时候，对于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可能完全分不到财产。如果存在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过错的，还要对无过错的一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这样一个责任。

此外，在子女抚养方面，解释还规定，离婚时，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如果一方存在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作为对其不利因素，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

在此也提醒大家，在恋爱期间注意了解对方的婚姻状况，以免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彰显保护婚姻家庭的国家意志

（来源：中国妇女报 记者：王春霞）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婚姻家庭矛盾呈现出新特点。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正式出炉。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对于贯彻落实民法典有何意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该如何认定？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离婚分割财产如何考虑配偶无形付出等因素，实现公平公正？……就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相关内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访多名专家进行详细解读。

对于贯彻落实民法典具有积极作用

在厦门大学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蒋月看来，解释（二）强调诚实信用这是民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在司法裁判规则中贯彻“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的原则，着力矫正过错行为并给予适当惩罚，平衡婚姻家庭等法律关系中相关利益主体各方的利益，强调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所有人都需要依法行事，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问题的解决上尤为突出。“婚姻作为一个共同体有其自身的利益，不一定与配偶一方的个人利益完全一致。解释（二）合理平衡个人与婚姻共同体的利益，非常重要。”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洪祥认为，解释（二）秉持的指导思想值得充分肯定，包括“维护公序良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平衡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与婚姻团体利益”“维护诚信原则，保护特殊群体利益”“平衡保护夫妻财产关系与市场交易安全”等，“这些指导思想不仅具有制定解释的积极意义，也具有解释适用的积极意义”。

李洪祥认为，解释（二）对贯彻落实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具有积极作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为解决婚姻家庭纠纷比较棘手、突出的问题提供了司法裁判规则和依据。

在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蕾看来，解释（二）非常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和现实需求，将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和尊重家庭伦理放在首位，在具体裁判规则中落实民法典关于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的原则，考虑婚姻共同体的特殊性等多种因素设计房产分割规则。此外，实现了多维度的利益平衡，体系化解决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各编以及公司法等部门法之间的协调一致问题。

关于重婚的效力，解释（二）明确重婚绝对无效的立场。蒋月对此给予充分肯定：“解释（二）坚持一夫一妻制，即使导致重婚的情形消失，只要后一个婚姻是在前一个婚姻存续期间缔结的，就应该是无效。”

解释（二）明确夫妻一方基于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等目的，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无效，夫妻另一方诉请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按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处理。

“解决了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蒋月说，根据解释（二）

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将被认定无效，取得财产的一方应当返还，如果没有必要返还，需要折价补偿。有过错的配偶一方还应当赔偿损失。

“看见”无形付出的价值

解释（二）在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夫妻间给予房产等具体争议解决的法律适用中，不作“一刀切”规定，强调在以出资来源作为分割财产基础的前提下，要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公平公正处理。

“按照中国传统和婚嫁习俗，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需要尊重出资人的意愿和利益指向。”蒋月告诉记者，婚姻家庭共同生活不是空中楼阁，其特殊性决定必须有人要付出，而且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可能算计清楚了才过日子。所以，客观上存在夫妻双方为婚姻、为家庭付出不平衡的现象。分割房产时，要实现公平，就不仅要看到财产来源这些看得见的有形财产，更要“看见”配偶一方在承担家务劳动、为家庭而放弃自身职业发展机会甚至放弃社会发展而全身回归家庭等无形贡献和付出的价值。

高蕾告诉记者，解释（二）充分考虑了家事案件的财产问题与普通民商事案件财产问题的本质不同，以往过于简单的财产分割裁判规则与丰富变化的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家庭成员之间或者夫妻之间财产流转与市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合同关系的本质区别。“更多考虑了

婚姻团体的特殊性，在漫长的婚姻中双方对家庭的显性、隐性付出，有利于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

高蕾认为，解释（二）对夫妻间给予房产、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离婚分割房产的规则传递了一个非常好的价值导向，就是引导当事人从过多关注房产登记情况，转为关注对家庭的付出。

将有效减少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发生

解释（二）第十二、十三、十四条专门规制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侵害禁令，及时快速制止不法行为；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请求，在监护权纠纷中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抚养事宜；在离婚纠纷中确定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直接抚养时，明确将抢夺、藏匿行为作为不利于直接抚养权的因素，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是近几年令人焦灼的社会问题。”蒋月告诉记者，未成年子女不仅需要日常生活照料，还需要得到情感满足和心理成长，父母双方理应扮演好各自的法律角色。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严重侵害了孩子的权益。由于孩子不是强制执行的对象，以往司法实践中存在“谁抢谁得利”的情形，解释（二）鲜明表达了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否定性评价，不允许通过违法行为达到目的，阻断了恶性循环。

“以往因没有明确规定，警察也很难处理。”高蕾认为，解释（二）明确了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是违法行为，非常重要。明确了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或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致使另一方无

法履行监护职责，可以参照离婚后子女抚养的规定，填补了空白。“现在离婚诉讼周期较长，而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

高蕾告诉记者，实践中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往往声称，是因为对方存在赌博、吸毒、家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行为。解释（二）明确，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违法行为合理化。此外，明确了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后果，法官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将有效杜绝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李洪祥认为，三个条文分别从制止不法行为、暂时解决抚养事宜到离婚时优先考虑由没有实施“抢娃”一方直接抚养等方面作出规定，反映出人民法院解决“抢娃”纠纷的具体步骤、办法，体现了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

在多子女时代离婚经济补偿非常有必要

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明确了离婚经济补偿数额的确定问题：“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确定补偿数额。”

“我们倡导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营造和谐家庭生活环境，也不能说做了一定的家务劳动就需要给予经济补偿。”李洪祥认为，最主要的经济补偿包括由于家务劳动丧失了机会利益、由于家务劳动使人力资本减少、家务劳动过多等。

蒋月调研发现：“这些年离婚经济补偿诉求有增多现象，在多孩政策时代，因为照顾未成年子女负担明显增大，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非常有必要。”

民法典生效时，北京市房山区法院曾判决一起离婚经济补偿案，女方获赔 5 万元。司法实践中，法官裁量因素并不统一。在蒋月看来，解释（二）明确了裁量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列举了“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是以往相关司法解释中未出现过的要素，将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营造家庭友好型的社会环境。“希望解释（二）实施后，能够提高判决确定的离婚经济补偿金额，减少补偿 2000 元、5000 元的个案情况。”

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细化了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明确生活困难的情形为，“存在年老、残疾、重病等”。

在李洪祥看来，解释（二）从困难发生的原因角度规定了适当经济帮助的情形，至于采取什么办法给予帮助以及帮助的时间等，没有特别具体的规范，需要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根据不同情况、法律规定、法律原则灵活掌握。

蒋月认为，对于个体的保障主要来自家庭和社会保障两大支持系统。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取得了较大进步，婚姻所发挥的保障作用有限。但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精神疾病甚至久治不愈的人有增多趋势，如何解决婚姻纠纷中的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解释（二）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在高蕾看来，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问题，可能会出现大量倒签或在另一方配偶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单方赠予协议的现象，“司法机关不能鼓励支持这些行为的发生。如果出现一方配偶不知情的情况，也要综合考虑，适当补偿非出资方”。此外，解释（二）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加大了当事人认可案件结果的难度，对法官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 新规速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为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请求确认重婚的婚姻无效，提起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被告以此为由抗辩后一婚姻自以上情形发生时转为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条 夫妻登记离婚后，一方以双方意思表示虚假为由请求确认离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权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或者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

第四条 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以及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

（二）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

第五条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给予方有证据证明另一方存在欺诈、胁迫、严重侵害给予方或者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对给予方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等情形，请求撤销前两款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六条 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和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处理。

夫妻一方存在前款规定情形，另一方以该方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规定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请求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

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

第九条 夫妻一方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十条 夫妻以共同财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均登记为股东，双方对相应股权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离婚时，一方请求按照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章程记载的各自出资额确定股权分割比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当事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夫妻一方以另一方可继承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放弃继承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主张另一方放弃继承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放弃继承导致放弃一方不能履行法定扶养义务的除外。

第十二条 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以另一方存在赌博、吸毒、家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主张其抢夺、藏匿行为有合理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依法通过撤销监护人资格、中止探望或者变更抚养关系等途径解决。当事人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相关请求的，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致使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另一方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有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

第十四条 离婚诉讼中，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

- （一）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 （二）有赌博、吸毒等恶习；
- （三）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
- （四）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
- （五）其他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第十五条 父母双方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处分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并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后，又以违反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为由向相对人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六条 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显著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要、另一方的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

前款但书规定情形下，另一方以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无抚养能力为由请求变更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未按照离婚协议约定或者以其他方式作出的承诺给付抚养费，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其支付欠付的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情形下，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并能够独立生活，直接抚养子女一方请求另一方支付欠付的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八条 对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中继子女受继父或者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综合考

考虑共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际进行生活照料、是否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予以认定。

第十九条 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后，当事人主张继父或者继母和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继父或者继母与继子女存在依法成立的收养关系或者继子女仍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的除外。

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继父或者继母请求曾受其抚养教育的成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抚养教育情况、成年继子女负担能力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但是继父或者继母曾存在虐待、遗弃继子女等情况的除外。

第二十条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

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子女可以就本条第一款中的相关财产直接主张权利，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子女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由该方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请求撤销该

约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同时请求分割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离婚诉讼中，夫妻一方有证据证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确定补偿数额。

第二十二条 离婚诉讼中，一方存在年老、残疾、重病等生活困难情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规定请求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给予适当帮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请求，结合另一方财产状况，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本解释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民政部等 18 部门联合印发《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办法》

（来源：民政部门户网站、中国社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宣传部、政法委、网信办、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教育厅（教委、教育局）、公安厅（局）、司法厅（局）、文化和旅游厅（局）、卫生健康委、广播电视局、妇儿工委办公室、工会、团委、妇联、残联、关工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宣传部、政法委、网信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教育局、公安局、司法局、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卫生健康委、妇儿工委办公室、工会、团委、妇联、残联、关工委：

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有关规定，依法加强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维护困境儿童个人合法权益，取得明显成效。同时仍存在信息保护意识不强、专业性不足、规范性不够等问题，不慎或者故意披露泄露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事件还时有发生。为依法做好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现将《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加大检查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避免发生问题。

民政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政法委

中央网信办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公安部 司法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广电总局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残联 中国关工委

2024 年 11 月 18 日

《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使用，保护困境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困境儿童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困境儿童，是指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有关政策界定的儿童。

第三条 困境儿童个人信息，是指以纸质、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困境儿童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第四条 各有关部门通过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方式处理困境儿童个人信息，应当依法进行，遵循“谁主管、谁负责，谁处理、谁负责”的原则，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

第五条 网信部门要履行监督管理责任，指导网络运营者加强网络信息筛查排查，发现披露泄露困境儿童个人信息的，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并会同有关部门妥善处理。

第六条 地方各级党委政法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服务机构等在案件侦查、调查取证、审查起

诉、法律监督、司法审判、法律援助、律师代理以及典型案例发布等工作中，应当依法做好涉案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第七条 民政部门在组织实施社会救助、慈善帮扶、关爱服务时，要依法保护困境儿童个人信息。监督指导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有关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等提高信息保护意识。

第八条 教育部门监督指导学校落实涉及学生隐私保护的各项规定，在奖励、资助、爱心捐助等工作中，不得泄露困境儿童个人及其家庭有关信息，依法保护遭受性侵害、暴力伤害等儿童的个人信息。

第九条 卫生健康部门监督指导医疗卫生机构、有关行业组织等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引导执业医师和其他医护人员恪守职业道德，依法保护患病或者遭受性侵害、暴力伤害等就医的困境儿童个人信息。

第十条 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关工委，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期间，需要处理困境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限于开展活动所必需的最小限度和范围，并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

第十一条 各级残联在工作中加强对困境儿童的个人信息保护，避免因残疾情况等个人信息的泄露引发对困境儿童的不公平对待。

第十二条 各有关部门要规范困境儿童个人信息的处理，不得违规披露、泄露困境儿童个人信息。

处理不满十四周岁困境儿童个人信息，应当取得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

处理年满十四周岁困境儿童个人信息等相关信息，应当依法取得困境儿童同意，并以明确方式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困境儿童因身心健康等原因没有表达意愿能力的，还应当征得困境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

第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布通讯、新闻等涉及困境儿童特定身份的，应当事先告知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依法征得困境儿童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后方可发布，同时做好技术处理。

第十四条 宣传、网信、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在制作、引进、播出各类涉困境儿童的图书、报刊、电影、广播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信息时，应当严格审查、严格把关，不得公开困境儿童的姓名、家庭住址、肖像、声音影像、就读学校及可能对其造成不良影响的其他内容。确因工作需要的，应当做好技术处理。

第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困境儿童标签化，不得利用困境儿童个人信息博眼球、赚流量，不得利用困境儿童个人信息进行募捐、直播带货等。

第十六条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因困境儿童通过其求助，需要公开有关信息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七条 困境儿童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权查询有关单位和组织处理的儿童个人信息，提出异议的，有关单位和组织应当充分尊重，及时调查核实，采取有效处置措施。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处理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侵害困境儿童合法权益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有关规定依法处置。

➡ 裁判动态

涉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2025 年 1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王丹出席发布会。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的基本情况。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

案例一：一方在结婚后将其婚前房产为另一方“加名”，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合理补偿对方。

——崔某某与陈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崔某某与陈某某（男）于 2009 年 1 月登记结婚。2009 年 2 月，陈某某将其婚前购买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崔某某、陈某某双方名下。陈某某为再婚，与前妻育有一女陈某。崔某某与陈某某结婚时，陈某 15 岁，平时住校，周末及假期回家居住。崔某某与陈某某未生育子女。2020 年，双方因家庭矛盾分居，崔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其与陈某某离婚，并由陈某某向其支付房屋折价款 250 万元。陈某某

某辩称，因崔某某与其女儿陈某某关系紧张，超出其可忍受范围，双方感情已破裂，同意离婚。崔某某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没有贡献，而且，婚后陈某某的银行卡一直由崔某某保管，家庭开销均由陈某某负担，故只同意支付 100 万元补偿款。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市场价值 600 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崔某某与陈某某因生活琐事及与对方家人矛盾较深，以致感情破裂，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与法不悖，予以准许。案涉房屋系陈某某婚前财产，陈某某于婚后为崔某某“加名”系对个人财产的处分，该房屋现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至于双方争议的房屋分割比例，该房屋原为陈某某婚前个人财产，崔某某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无贡献，但考虑到双方婚姻已存续十余年，结合双方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酌定崔某某可分得房屋折价款 120 万元。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根据民法典第 1065 条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将其个人所有的婚前财产变更为夫妻共同所有，该种给予行为一般是以建立、维持婚姻关系的长久稳定并期望共同享有房产利益为基础。离婚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平衡双方利益。本案中，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但婚后给予方负担了较多的家庭开销，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酌定给予方补偿对方 120 万元，既保护了给予方的财产权益，也肯定了接受方对家庭付出的价值，较为合理。

案例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父母将其房产转移登记至夫妻双方名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并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合理补偿对方。

——范某某与许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 年 12 月，许某某（男）父母全款购买案涉房屋。2020 年 5 月，范某某与许某某登记结婚。2021 年 8 月，许某某父母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范某某、许某某双方名下。范某某与许某某婚后未生育子女。2024 年，因家庭矛盾较大，范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其与许某某离婚，并平均分割案涉房屋。许某某辩称，同意离婚，但该房屋是其父母全款购买，范某某无权分割。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市场价值为 30 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范某某起诉离婚，许某某同意离婚，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依法准予离婚。关于案涉房屋的分割，虽然该房屋所有权已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转移登记至范某某和许某某双方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考虑到该房屋系许某某父母基于范某某与许某某长期共同生活的目的进行赠与，而范某某与许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无婚生子女，为妥善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故结合赠与目的、出资来源等事实，判决案涉房屋归许某某所有，同时参考房屋市场价格，酌定许某某补偿范某某 7 万元。

【典型意义】

根据民法典第 1087 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购置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夫妻双方名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根据该财产的出资来源情况，判决该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但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本案中，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未孕育共同子女、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并酌定出资方子女补偿对方 7 万元，既保护了父母的合理预期和财产权益，也肯定和鼓励了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较好地平衡了双方利益。

案例三：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颜某某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

【基本案情】

2015 年，颜某某与罗某某（男）登记结婚。2022 年 7 月，颜某某生育双胞胎子女罗大某（男）、罗小某（女）。罗大某、罗小某出生后，与颜某某、罗某某共同生活居住在 A 省。因家庭矛盾未能得到有效调和，2024 年 3 月，罗某某及其父母、妹妹等人将罗大某强行带离上述住所并带至 B 省。此后，罗大某与罗某某的父母在 B 省共同生活居住。经多次沟通，罗某某均拒绝将罗大某送回。颜某某遂提起本案申请，请求法院裁定罗某某将罗大某送回原住所并禁止罗某某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身份权，抢夺行为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的人格权益和父母另一方因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颜某某以其对儿子罗大某的监护权受到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禁令，人民法院依法应予受理并可以参照民法典第 997 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因抢夺子女形成的抚养状态，是一种非法的事实状态，不因时间的持续而合法化。该抢夺子女的行为强行改变未成年子女惯常的生活环境和亲人陪伴，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伤害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人民法院裁定罗某某自收到裁定之日起七日内将罗大某送回原住所，并禁止罗某某实施抢夺、

藏匿子女或擅自将子女带离住所等侵害颜某某监护权的行为。本案裁定发出后，人民法院组织对双方当事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并现场督促罗某某购买车票将罗大某从 B 省接回 A 省。

【典型意义】

解决分居状态下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问题的前提是及时快速制止不法行为，尽量减少对未成年人的伤害。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可以进行事先预防性保护，避免权利主体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民法典第 1001 条规定，对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在相关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身份权，人民法院针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997 条规定签发禁令，能够快速让未成年子女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是人格权保护事先预防大于事后赔偿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对不法行为形成有力的法律震慑。

案例四：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反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的行为无效，另一方请求第三人全部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崔某某与叶某某及高某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崔某某与高某某（男）于 2010 年 2 月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某某与叶某某存在不正当关系，并于 2019 年 3 月至 2023 年

9 月向叶某某共转账 73 万元。同期，叶某某向高某某回转 17 万元，实际收取 56 万元。崔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叶某某返还崔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73 万元。叶某某辩称，高某某转给其的部分款项已消费，不应返还。高某某认可叶某某的主张。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况下，对夫妻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本案中，高某某未经另一方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多次转给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叶某某，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故该行为无效，叶某某应当返还实际收取的款项。对叶某某关于部分款项已消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根据民法典第 1043 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私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不仅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更是一种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法律对此坚决予以否定。权益受到侵害的夫妻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并请求返还全部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能因已消费而免除其返还责任。该判决对于贯彻落实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的宪法和民法典基本原则，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示范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继承制度是有关财富传承和弱者帮扶的重要制度，处理好继承纠纷，直接关系到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专设继承编，对继承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相关规定，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妥善审理继承纠纷案件。

为切实发挥司法裁判规范、评价、教育、引领功能，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各地法院报送的案例中精心挑选，选取两批共计八个案例，将先后予以发布。

本次发布的第一批四个案例，主要涉及遗产管理人等民法典新增制度的适用、裁判标准的统一以及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等优秀的做法。本批案例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准确适用立法新规定，指引当事人用好法、善用法。为使遗产得到更为妥善地处理，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选任、职责、权利等。案例一中，人民法院主动向当事人告知关于遗产管理人的规定，指导分居国内外的当事人共同选定遗产管理人，完成清理遗产、制作遗产清单、报告遗产等事宜，最终引导各方当事人就遗产分割达成和解协议，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案例二中，

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制度的规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认定。

第二，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标准。司法实践中，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作为遗产继承，存在不同理解。案例四中，人民法院通过案件裁判，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户为单位取得，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户主死亡后，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其遗产，不发生继承问题，户内其他家庭成员在承包期内可以继续享有承包权益。本案处理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第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多元化解纠纷。妥善解决继承纠纷，需要重视调解工作，并善于运用多元化解纠纷机制。案例一中，人民法院积极借助村委会、房屋征收指挥部的力量，为案件化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案例三中，人民法院参与了纠纷处理的全过程，提前介入、指导调解，与当地基层组织、综治中心协力促成当事人间矛盾的化解，后又进行了司法确认。之后当事人还将遗产捐赠给了村委会，最终用于修缮道路、惠及友邻，既解法结又解心结。

案例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王某诉赵某等法定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被继承人赵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共生育赵一、赵二、赵三。赵某与王某二人在某村建造房屋 11 间。2000 年，赵某去世，未留有遗嘱，赵某父母也早于赵某去世。2016 年，王某与当地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办公室签订房屋征收补偿预签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产权调换三套楼房及部分补偿款。王某于 2022 年收到回迁入住通知书。现王某与赵一、赵二、赵三就赵某的遗产继承事宜协商未果，诉于法院。各方对于赵某留有的遗产如何管理未有明确意见。

【裁判情况】

本案当事人除王某外，赵一、赵二、赵三均在国外生活。为妥善处理此案，审理法院前往村委会、房屋征收指挥部了解被继承人赵某的家庭成员情况、遗产范围及状况、遗产所涉债权债务等情况，并向当事人依法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规定，当事人均表示同意确定一名遗产管理人处理遗产继承事宜，并一致推选现居国内的王某作为遗产管理人。王某在审理法院引导下及时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多次通过在线视频的方式向其他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经析法明理耐心调和，各方当事人最终就遗产分割达成和解协议。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选任、职责等内容。本案处理过程中，一方面，审理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借助村委会、房屋征收指挥部的力量，全面了解遗产状况和继承人相关情况，为案件化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审理法院充分发挥遗产管理人制度的作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依法引导当事人推选出合适的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并指导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得到了其他继承人的一致认可，是法定

继承案件中适用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最终，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案例二：被继承人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且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贾某一、张某诉贾某二、贾某三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 年，贾某去世，无配偶，无子女。贾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先于其去世。贾某有贾某一、贾某二、贾某三、贾某四这四个兄弟姐妹。贾某四于 2007 年去世，生前育有一女张某。现贾某一、张某将贾某二、贾某三诉至法院，主张共同继承贾某名下房产，各享有 25% 的产权份额。

【裁判情况】

审理法院认为，被继承人贾某未留有遗嘱，生前无配偶及子女，父母均先于其死亡，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中，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先于其去世，故应由其兄弟姐妹继承。贾某的妹妹贾某四先于贾某死亡，应由贾某四女儿张某代位继承。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贾某二、贾某三在贾某生前尽到了更多的扶养义务，在贾某去世后亦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依法应予适当多分。张某在诉讼中自愿将其应继承份额各半赠与贾某二、贾某三，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依法予以准许。遂

判决：诉争房屋由贾某一继承 20%的产权份额，贾某二、贾某三各继承 40%的产权份额。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原有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的基础上新增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的规定，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可以保障财产在家族内部的传承，减少产生无人继承的情况，同时促进亲属关系的发展，鼓励亲属间养老育幼、相互扶助。同时，对尽了更多扶养义务的继承人适当多分遗产，以及张某在诉讼中自愿赠与继承份额的做法，不仅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有力弘扬了家庭成员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维护亲情的和谐家风。

案例三：村委会善意为老人送终，继承人感恩捐赠遗产——秦某某与程某英等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

程某与秦某某婚后生育程某英等四子一女。程某于 2022 年病故，因其子女均在外工作，村委会出资为其购置棺材等丧葬用品并办理了丧葬事宜。程某生前尚有存款人民币余额 9 万余元，其配偶秦某某与程某英等五个子女因继承权发生纠纷。

经当地村委会及镇综治中心、镇人民法院共同组织调解，程某英等子女感谢村委会的帮扶，均愿意先将各自享有的遗产份额赠与秦某某，再由秦某某出面将遗产赠与村委会。经当地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各方当事人就遗产份额赠与秦某某之意达成调解协议，后就调解协议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司法确认后，秦某某将遗产赠与村委会，最终用于修缮当地道路，惠及本村友邻。

【裁判情况】

审理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符合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定条件，遂裁定该调解协议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自觉履行义务。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本案中，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主动帮助子女不在身边的村民处理身后事；继承人感恩帮扶，最终一致决定将遗产捐赠，也是一种善意的传递，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本案也是一起通过诉前调解和司法确认，多元化解继承纠纷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从纠纷产生便主动参与调解，与当地基层自治组织、综治中心协力促成当事人间矛盾的化解，后又应当事人申请进行了司法确认，并见证了当事人将案涉遗产赠与村委会及村委会将遗产用于修缮当地道路，参与了纠纷处理的全过程，帮助当事人既解开了法结，又打开了心结，保全了珍贵的亲情。

案例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遗产继承，该户其他成员继续享有承包经营权——农某一、凌某、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诉农某五法定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

农某与凌某系夫妻，育有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农某五是农某与他人所生。农某五从小随农某与凌某生活长大。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已另成家立户。

2017 年，农某作为承包方代表与其所在村民小组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该合同的附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载明：承包地块总数为 5 块 5 亩，家庭成员共 3 人，成员姓名为农某、凌某、农某五。农某于 2022 年去世。农某去世后，凌某、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作为原告，将农某五诉至法院，要求由凌某继承农某名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50%，余下 50%由凌某及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平均继承。

【裁判情况】

审理法院认为，农某与村民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权利人不只是农某本人，还包括凌某和农某五，三人同为一个承包主体。当农某去世后，承包地继续由承包户其他成员继续经营，体现的是国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不是农某承包户成员，无资格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某去世后，案涉土地应由承包户剩余的成员凌某、农某五继续经营。

凌某、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诉请继承土地经营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五人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以户为单位取得，在承包户的户主或某成员死亡后，其他成员在承包期内可以继续承包，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死者的遗产，不产生继承问题。本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进行了处理，明确了裁判规则，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 案例评析

父母婚后购房出资纠纷案例评析：借款与赠与的法律边界审视

（来源：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江骋骏律师）

在家庭财产纠纷中，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的性质认定常常引发争议，本案便是此类纠纷的典型示例。通过对一审、二审法院观点的剖析，以及对关键法律问题的探讨，可以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参考。

一、案情回顾

李玲与王洪超于 2012 年结婚，段莹是李玲的母亲。2013 年 11 月，李玲和王洪超共同购买位于通州区的房屋，总价款 22971000 元，后续还支付了契税、产权代办费等相关费用。购房期间，段莹通过多种方式向李玲、王洪超转款，包括银行转账、现金存款等。段莹主张这些款项是出借给二人用于购房、房屋加建装修及支付相关费用，并提供了与李玲签名的《借款协议》和李玲出具的《欠条》作为证据。

段莹曾先后以所有权确认纠纷和返还原物纠纷起诉，均未成功。后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段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段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部分支持了段莹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玲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王洪超在部分本金范围内与李玲共同偿还段莹。

二、法院观点梳理

（一）一审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借贷双方达成合意，出借人应承担举证责任。段莹提交的证据存在诸多疑点：《借款协议》和《欠条》仅有段莹和李玲签字，王洪超未签字，且签订时间在双方关系不睦之后；段莹首次起诉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与借款主张不符；借款协议约定利率高于房屋贷款实际利率；部分款项来源不明，无法证明均为段莹自有资金；段莹关于购房的意思表示与借款主张相互矛盾；房屋加建、装修及相关费用难以认定为借款。综合以上因素，一审法院认定段莹未能充分举证，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二审法院观点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不能仅凭《借款协议》和《欠条》认定借款关系，但段莹提供了完整的银行转账明细，且李玲认可借款事实。王洪超主张款项为赠与，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段莹与李玲的借款关系成立。

对于王洪超应承担的责任，二审法院认为王洪超称非洲公司款项是其个人或夫妻共同收入缺乏证据支持。案涉房屋购置款大部分源于段莹，李玲借款用于购买夫妻共有房屋，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王洪超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但段莹主张的款项中部分用于其个人居住的费用，以及超出购房款部分，不属于王洪超应承担的夫妻共同债务范围。

三、案例评析

一审法院观点合理性分析

（一）对借贷合意的谨慎审查

一审法院正确认识到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关键在于借贷双方的合意，并且出借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借款协议》和《欠条》仅有段莹与李玲签字，王洪超并未参与签署。考虑到段莹与李玲的母女关系，这种亲属间的签字可能无法客观反映真实的借贷合意。而且，这些凭证的签订时间处于双方关系不睦之后，尤其是《欠条》出具于李玲、王洪超离婚诉讼期间以及段莹第一次起诉之后，此时形成的凭证存在较大的利益驱动因素，难以作为认定借贷关系的可靠依据。

（二）对证据关联性和合理性的综合判断

一审法院对段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全面且合理的审查。从起诉案由来看，段莹第一次起诉时选择的是所有权确认纠纷，若当时其已持有证明借款关系的关键证据《借款协议》，却未选择民间借贷纠纷作为案由，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此外，案涉房屋办理的银行贷款年利率低于《借款协议》约定的利率，李玲、王洪超放弃较低利率而选择向段莹借款并承担更高利率，这一行为也不符合正常的经济逻辑。同时，段莹主张的出借资金部分来源于其与李玲的联名账户，无法明确区分是否为段莹自有资金，还有部分款项是李玲或王洪超自己的转账或现金存款，且王洪超婚前房屋出售款也用于偿还案涉房屋贷款，这些情况都使得段莹主张的借款关系难以清晰认定。一审法院综合这些因素，认定段莹证据不足，充分体现了对证据关联性和合理性的严谨判断。

二审法院观点的不合理之处：

（一）对借条证明力的过度采信

二审法院在一定程度上过度依赖《借款协议》和《欠条》以及银行转账明细来认定借款关系成立。虽然转账明细能证明资金的流动，但无法直接证明这些资金就是借款而非其他性质的款项往来。在段莹与李玲存在密切亲属关系，且王洪超未认可借款的情况下，仅依据李玲的确认就认定借款关系，忽视了亲属间可能存在的人情因素对借条签署的影响。这种认定方式过于简单化，未能充分考虑到家庭内部经济往来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二）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偏差

二审法院认定王洪超基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责任的依据存在问题。虽然案涉房屋为夫妻共有，但不能仅仅因为李玲借款用于购房就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王洪超对借款并不知情且未在借款凭证上签字，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王洪超对借款知晓并同意，或者该借款确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除购房外，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借款用于其他夫妻共同生活事项）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将部分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扩大了王洪超的责任范围，对王洪超而言有失公平。

四、结论

综合来看，一审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更为审慎和合理，通过对证据的细致审查和对法律关系的准确判断，严格遵循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维护了司法的严谨性。而二审法院的判决在证据采信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方面存在不足，未能充分考虑案件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可能导致判决结果有失偏颇。在处理类似父母为子女婚后购

房出资纠纷时，应更加重视一审法院所采用的全面审查证据、谨慎认定借贷合意的方法，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来源：（2020）京民终 380 号

2024 年婚姻家庭法经典案例——律师代理 C 先生与 Z 女士离婚纠纷及婚约彩礼纠纷案

（来源：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王舒畅律师）

【案情简介】

Z 女士，女，生于 1997 年，公司职员；C 先生，男，生于 1970 年，私营公司中层干部。2022 年 9 月，Z 女士与 C 先生在相亲会上结识，此后二人迅速发展为恋人关系，并产生结婚意愿。Z 女士及家人向 C 先生索要彩礼 1000 万及房产加名，后双方协商至 C 先生向 Z 女士支付彩礼 100 万元。2022 年 12 月 11 日，C 先生向 Z 女士指定账户支付 100 万元，二人于次日登记结婚。婚后 Z 女士搬进 C 先生婚前购买房屋共同生活。其间 Z 女士多次因要求 C 先生房产加名、索要生活费等琐事发生争吵，2023 年 6 月 Z 女士又因琐事与 C 先生争吵，事后未经告知 C 先生即自行搬出同居房屋，并于 2023 年 12 月向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离婚并分割 C 先生名下房屋、车辆、银行存款、理财收入、公司股权及股权分红（总价值约 2000 万元）。被告 C 先生委托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王舒畅律师作为其离婚纠纷案诉讼代理人应诉，并代理其向法院依法提起反诉，要求 Z 女士返还彩礼 80 万元。

【代理意见】

一、原、被告分居后产生的财产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认定及分割“分居”的法律定义应当是指夫妻双方不再共同生活、再无经济往来、再无相互经济扶助。Z 女士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自认于 2023

年 6 月底搬离同居房屋开始分居，Z 女士与 C 先生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二人自 2023 年 6 月开始分居。分居后，二人再无情感交流，也再未尽过夫妻义务，两人的财务状况相互独立无任何混同情况，因此原、被告自 2023 年 6 月开始符合法定的分居条件。自该时起，原、被告应实行分别财产制，之后新产生的财产不应算作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计算本案夫妻共同财产的期限应自 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3 年 6 月止。一审判决未将夫妻共同财产限定在同居期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二、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意见

1、C 先生婚前全款购买的别墅及车辆属于 C 先生婚前个人财产，不应予以分割，房屋婚后增值部分属于自然增值，不应予以分割。

2、C 先生微信账户中的 x 十万余额为 C 先生代公司收取的电费，属于公司财产，且公司已多次催促 C 先生将电费转入公司账户，在诉讼中 C 先生已将全部电费返还给公司，不应予以分割。

3、根据银行流水显示，C 先生银行理财产品的本金均来源于婚前存款，属于 C 先生婚前个人财产，不应予以分割；理财产品属于风险投资，婚后尚未赎回的理财产品的收益尚未确定及实际产生，不应予以分割；已赎回理财产品的收益应限定在同居期间，分居后产生的理财产品收益不应予以分割。

4、C 先生的公司股权系婚前取得，属于 C 先生婚前个人财产，不应予以分割；该公司在张某、C 先生同居期间未产生盈利，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分红条件，也未实际分红，无法进行分割；公司

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公司资产与股东资产相独立，公司资产不应予以分割。

5、张某对夫妻共同财产应少分或不分：其一，张某在同居期间经常借婚姻索要财物，而“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要财物”、在婚内“借婚姻索要财物”的行为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明令禁止，因此张某在婚姻中存在过错；其二，C 先生申请调取张某的支付宝账户信息，法院已要求张某提供其支付宝账户信息，但张某至今仍未提交，其涉嫌隐瞒、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法院最终仅将 C 先生的工资及理财收益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三、关于彩礼返还的意见

（一）C 先生与 Z 女士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彩礼返还比例，平衡男女双方利益，保护出资方的合法权益

- 1、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仅 6 个月：2022 年 12 月 12 日登记结婚并同居，2023 年 6 月 21 日前 Z 女士无故搬离并消失，此后二人开始分居，再未共同生活。
- 2、彩礼数额过高，高达 100 万元：2023 年燕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3459 元，C 先生一年工资收入为 96000 元，彩礼数额是燕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18.7 倍，是 C 先生年收入的 10.4 倍，该彩礼数额不论对普通家庭或是小康家庭均属过高。
- 3、Z 女士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Z 女士在共同生活期间持续借婚姻索要财物，而该行为正是导致二人经常发生争吵、最终二人分居并离婚的原因。Z 女士借口其经济困难而索要财物，实际上 Z 女士每月

收入较高，且将全部收入全额转入支付宝理财或财付通中，“经济困难”“索要生活费”“房子加名”均是其索要财物的借口。

（二）以下两则参考案例及典型案例所确定的返还比例请予以参考：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 2024 年 2 月 1 日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2 月 24 日在人民法院案例库内发布四则婚姻财产纠纷参考案例。其中董某诉朱某婚约财产纠纷案，双方登记结婚后共同生活 3 个月，彩礼 106 万元，判决返还 80 万元，返还比例为 75.47%。

（2）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发表于《人民司法》2024 年第 10 期《〈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提及：“2023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的 4 起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之案例一，双方共同生活 1 年多时间，彩礼数额较高，给付方不存在明显过错，女方存在终止妊娠情形，法院综合各种因素判决酌情返还 30% 的彩礼，较好地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即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的 4 起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之案例一“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离婚时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孕育子女等事实对数额过高的彩礼酌情返还——王某某与李某某离婚纠纷案”）对比以上案件所确定的返还比例，本案共同生活 6 个月，彩礼数额 100 万元，一方没有明显过错，彩礼返还比例至少应在 30%~75.47% 之间方能符合立法目的，也方能

平等保护男女双方利益、以及婚姻中出资方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返还 30%彩礼过低，不能平衡双方利益。

（三）本案的司法审判意义经检索，2024 年 2 月 1 日新彩礼纠纷司法解释施行前，本案涉及的 100 万元彩礼数额为燕郊地区及廊坊市地区婚约彩礼纠纷案件中的最高标的额；2024 年 2 月 1 日后，新彩礼纠纷司法解释注重平等保护原则，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而本案在本市乃至本省婚约彩礼纠纷中仍为彩礼数额最高的案件，且为天价彩礼，因此本案必将成为本市乃至河北省新彩礼纠纷司法解释施行后的典型案例，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案应倡导正确的婚恋观，将婚恋回归感情的本质，以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

（四）一审法院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之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裁量彩礼返还的具体比例时，应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并“结合当地习俗”，并不包括给付方的经济情况。彩礼纠纷案件应当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平等保护妇女及给付方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将 C 先生的个人经济情况良好作为少返还彩礼的考量因素，不仅有违法律规定，也将导致法院将经济能力弱及经济能力强的人区别对待，有失公平。

【裁判结果】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作出一审判决书,准予 Z 女士与 C 先生离婚,C 先生向 Z 女士支付共同财产价款 123929.57 元,Z 女士向 C 先生返还彩礼 30 万元。C 先生不服一审判决内容,向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

【裁判文书内容】

本案一审判决内容:本院认为,关于离婚问题,夫妻感情破裂是判决离婚与否的标准,现原、被告均认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故对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夫妻共同财产问题,被告名下某银行理财收益 xx 万元、工资 xx 万元,原告名下某银行账户 x 千元余额,双方均能主动提供,应平均分割,双方各享有 50%份额,综上被告应给付原告共同财产价款 123929.57 元,原告应给付被告共同财产价款 x 千元;关于彩礼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财力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原、被告均主张对方存在骗婚情形,但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被告婚前婚后的银行流水、购买理财情况、公司持股情况以及名下不动产,其经济情况较

好，但结合本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风俗习惯，本院认定 100 万元彩礼过高，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故彩礼应予部分返还。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情况、被告的经济能力，以及被告在家庭生活中确实对原告缺少关心和信任等情形，本院酌定原告返还被告彩礼 30 万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判决如下：

一、准予原告 Z 女士与被告 C 先生离婚；

二、被告 C 先生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 Z 女士共同财产价款 xx 万元；

三、原告 Z 女士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被告 C 先生共同财产价款 x 千元；

四、原告 Z 女士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被告 C 先生彩礼 30 万元。本案二审裁定内容：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关于彩礼问题。综合考虑三河市燕郊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当地风俗等因素，C 先生支付的 100 万元彩礼，数额明显过高，且双方婚后仅半年即开始分居，共同生活时间较短。本案发回后，应结合彩礼数额及双方的过错情况，综合确定 Z 女士应返还彩礼的比例。另外，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均认可共同生活至 2023 年 6 月，因之后双方均未尽夫妻义务，故应以该时间为节点查明双方名下的财产情况，并根据查明情况作出公正判决。

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24）冀 1082 号民初 xx 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重审。

【案例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的法律问题是：高额彩礼的认定及返还比例、分居对夫妻共同财产认定及分割的法律效果，以下进行简要分析：

一、关于高额彩礼的认定及返还比例问题

（一）本案的社会意义移风易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受到公众普遍关切，成为社会的一大痛点。尤其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攀比之风蔓延。这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使彩礼给付方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不利于社会文明新风尚的弘扬。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2021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提出工作要求。遏制高额彩礼陋习、培育文明乡风成为社会的共同期盼。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高额彩礼与婚龄偏短问题交织，使得矛盾冲突更为激烈，甚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

简称“彩礼司法解释”）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应运而生，该司法解释不仅指出高额彩礼为法律所禁止，并且明确了审判实践中的具体裁判规则。本案彩礼数额高达 100 万元，根据检索可知，本案成为彩礼司法解释实施以来廊坊地区婚约彩礼纠纷最高标的额的案件，具有典型性与示范性，也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二）已登记结婚且共同生活，但生活时间较短、彩礼数额过高的彩礼返还案件办理难点彩礼司法解释主要涵括了四种情形的彩礼返还审理思路：

1、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的，原则上不予返还；

2、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特定情况下部分返还；

3、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则上应当返还；

4、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的，特定情况下予以部分返还。

本案针对的即为第二种情形，即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针对已婚且的彩礼返还裁判规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确未共同生活”或“彩礼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才予以部分返还发展到彩礼司法解释的“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综合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即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综合确定返还比例，本身即蕴含着立法目的从单一保护妇女权益发展到对妇女权益及给付方权益平等保护的变化和调整。但彩礼司法解释自 2024 年 2 月 1 日实施后，多数法院并未调整审判思路，在审理已婚且共同生活的彩礼纠纷案件

时，仍然将男方的经济状况及经济承受能力作为彩礼返还比例的考量因素。同时，彩礼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每种情形下的具体返还比例，而是规定了一个动态的评判标准，将“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即孕育情况”“双方过错”“当地习俗”综合作为法院应当考量的法定因素，针对个案的特殊情况进行判断，其本意应为考虑到个案的独特性因而不限定具体标准，但每个法院对于具体的返还比例裁判不一，却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不公平现象。

（三）本案的办理思路及创新型本案首先需明确是否属于“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彩礼数额过高”的情形。为证明本案存在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情形，代理人综合提交了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一审庭审笔录作为参考，从而证明了双方结婚后仅半年即分居，共同生活时间仅半年，并为二审法院所确认。针对彩礼数额过高的情形，代理人综合对比了燕郊地区城镇居民 2022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C 先生的年收入、Z 女士的年收入及本地彩礼纠纷案件的标的额，从而说明本案彩礼数额过高，并最终为二审所确认。其次，在确定了本案满足“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彩礼数额过高”的情形后，应确定最终返还的合理比例，以促使本案裁判结果平衡男女双方利益，并保护 C 先生的合法权益。律师在代理过程中，检索并对比了以下两则经典参考案例，并向法院提交了该二项典型参考案例，作为合理裁判区间的建议。

其一，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2 月 24 日在人民法院案例库内发布了四则婚姻财产纠纷参考案例。其中董某诉朱某婚约财产纠纷案即作为已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彩礼数额过高的典

型案例，明确了该种情形下的参考返还比例。该案中，双方登记结婚后共同生活 3 个月，彩礼 106 万元，判决返还 80 万元，返还比例为 75.47%。该案例基本可以作为类似情况下的返还上限。

其二，2023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的 4 起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之案例一“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离婚时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孕育子女等事实对数额过高的彩礼酌情返还——王某某与李某某离婚纠纷案”，该案中双方共同生活 1 年多时间，彩礼数额较高，给付方不存在明显过错，女方存在终止妊娠情形，法院综合各种因素判决酌情返还 30% 的彩礼。综合各项因素，该案例基本可以作为类似情况下的返还下限。经对以上两则经典参考案例的对比可以明确，本案彩礼返还比例应至少超过 30% 且不低于 75.47% 方能平衡双方利益。本案不存在孕育情况，但一审法院判决的返还比例（即 30%）却与存在孕育情况的它案比例相同，且判决比例远低于合理区间，显失公平。

以上合理裁判区间的建议为二审法院采纳，最终二审法院认定“综合考虑三河市燕郊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当地风俗等因素，C 先生支付的 100 万元彩礼，数额明显过高，且双方婚后仅半年即开始分居，共同生活时间较短。本案发回后，应结合彩礼数额及双方的过错情况，综合确定 Z 女士应返还彩礼的比例”，并将本案发回重审，实现了良好的代理效果。

二、关于分居对夫妻共同财产认定及分割的法律效果的问题

（一）分居的法律内涵“分居”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之第二款第四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我国婚姻法对诉讼离婚原因采取法定理由说，即“感情确已破裂”，因感情不和分居满特定时长是“感情确已破裂”的一种法定情形。但我国法律仅承认分居的事实，而并未对分居的要件法定化。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分居”不应仅为“分开居住”，其法律定义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夫妻间不再共同生活，不再互相履行夫妻义务，包括停止性生活、经济上不再合作、生活上不再互相关心、互相扶助等，应根据以上情形综合认定“分居”事实。

（二）分居的法律效果分居表明夫妻双方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分居的性质“既不能完全归于婚姻存续期间的性质，也不能完全和离婚后的性质相同”，在法律后果方面，分居也应该与正常情况下夫妻共同生活有所区别。在夫妻人身方面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分居期间虽然没有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免除了夫妻之间相互扶养的义务，双方没有再婚的权利，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依然存在。在财产方面，夫妻之间仍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但在分居期间继续施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已不公平，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实行分别财产制，即分居期间双方各自收入归各自所有，各自的债务也应当各自承担。针对本案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男女双方经济实力悬殊的特殊情况，若双方分居期间仍适用共同财产制，则对 C 先生一方严重不公。

本案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应限定在双方同居期间，C 先生与 Z 女士分居期间应适用分别财产制方为公正。该观点最终为二审法院所采纳，保护了 C 先生的合法权益。

【结语】

婚姻家庭关系是最基础、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细胞，大的社会变革影响家庭细胞，而家庭细胞的变化也将反过来推动社会的变革，从这个角度讲，个人命运、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婚姻家庭事关每一个人，婚姻家庭的稳定关系整个社会的稳定，家和”才能“万事兴”。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家和”已有了多重定义，双亲有孩家庭、双亲无孩家庭、离异家庭、丧偶家庭、未婚有孩家庭、单个个体……无论哪一种家庭，都可以在新时代活出自己的幸福生活，找到属于自己对于幸福的“独家定义”，因此婚姻不能单一定义幸福，有时体面放手也是一种成全。本案委托人 C 先生通过法律途径结束失败关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法律制度中感受到了饱满的安全感。本案中，代理人经与法官多次沟通并多次提交代理意见、质证意见等书面材料，为委托人最大程度争取相应权益，使法院的观点从保护一方利益过渡到平衡保护双方利益，最终最大程度挽回了委托人因失败婚姻而产生的损失。因此本案的处理方式及处理结果正可以回应如何平衡婚姻双方的利益及如何保护出资方权益，对离婚案件中同样存在分居情况的夫妻共同财产认定及高额彩礼返还等的案件及婚姻关系双方如何降低同类法律风险具有参考价值。

➡ 业务研究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法律适用中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

——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为视角

（来源：《法律适用》2025 年第 1 期 作者：陈宜芳、王丹）

摘要：

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应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以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为目标，平衡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与家庭团体利益；平衡保护婚姻家庭与交易安全；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实现实质正义；注重维护婚姻家庭的伦理性特征；准确适用参照适用的法技术规则，体系化解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各编以及公司法等部门法之间的规定，实现法律适用的协调一致；维护公序良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 家庭团体利益 交易安全 伦理性 体系解释 公序良俗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民法典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解决了民事法治建设的所有问题，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探索，还需要不断配套、补充、细化。有关国家机关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加强同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的国家有关规定，要抓紧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要发挥法律解释的作用，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

法律依据，保持民法典稳定性和适应性相统一。”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在清理相关司法解释，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2号，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基础上，针对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秉持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各编以及公司法等部门法的体系化解释理念，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法释〔2025〕1号，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本文拟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法律适用中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为主线，结合该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及主要内容，作一简要解析。

婚姻家庭关系是基于两性关系、血缘关系和扶养关系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婚姻家庭法属于典型的身份法。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我国的婚姻观念、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新变化。如何回应社会新需求，在尊重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引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在法律层面，婚姻法回归民法体系后，如何协调财产法和身份法，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平衡交易安全与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如何在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原则的同时，特别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

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立足新的国情、社情、民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以民法典基本原则和具体法律规定为基础，体系化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努力为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提供司法保障。

一、平衡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与家庭团体利益

近现代以来，个人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现代以来的私法主要以财产的归属与交易为重心，具有高度形式理性化特征。在内容上，财产法以权利为核心，个人权利在法律上被表达为利益的正当性评价。个人权利不仅是个人正当利益的固定，还是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自由。相应地，家庭以婚姻关系为核心，以情感关系为基础，具有伦理性和利他性，夫妻双方表现的是全方位的人格投入。这就导致二者间天然存在巨大张力。“理性人”作为通常所描述的“民法中的人”的典型形象，大体上等同于财产法上的“经济人”，从事民事活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婚姻家庭法背后并不存在“个人主义的自由契约”所构成的人类图像。相反，其被理解为一种超个人主义式的生活图景。在理想中，家庭能够促使家庭成员之间形成温暖和亲密的关系，并为家庭成员提供安全的环境。相比经济团体，夫妻团体内部仍然存在广泛的利他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

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宪法》第 49 条第 1 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民法典也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增加“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规定，作为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可见，家庭虽然不是民法上独立的民事主体，但作为社会基本细胞，是特别保护的主体。维护好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不仅从最终结果上有益于每个人，更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家庭法的当代价值取向更应当是在家庭成员自由的、无强制的交流之中产生一种团体认同”。因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民法典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的基本价值理念，在维护个人合法权益与维护家庭团体性之间实现平衡，是实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重要内容。

在平衡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与家庭团体利益方面，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问题。在子女结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既是我国传统家庭财产代际传承的方式，也是父母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祝福和物质支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子女离婚时，父母的希望可能落空，利益平衡被打破。如何审理好相关案件，实现父母权益与配偶一方权益的平衡保护，长期以来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难题。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3〕19 号，已废止）第 22 条到《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1〕18号，以下简称“原《婚姻法解释（三）》”，已废止]第7条，再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9条，司法政策一直在探寻更好的解决方式。

笔者认为，保护出资父母一方权益和保护子女配偶一方权益均有一定道理，只是所处立场不同。此情况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实际上是个人主义与婚姻家庭团体主义之间张力的体现。保护出资父母一方权益体现的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尊重；而维护子女配偶一方合法权益，有助于增强其对家庭的认同，鼓励其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并协助另一方更好地赡养父母，实际上蕴含着对婚姻家庭的保护，且从根本和长远上有利于保护出资父母一方权益。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上如何处理，而在于基本理念如何确定。

首先，应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宪法和民法典关于保护婚姻家庭基本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出发点。在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注重对家庭团体的保障力度，明确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由于家庭观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根深蒂固，因此在坚持个人的人格独立与自主时，应当在制度安排上注重维护婚姻制度和强化国家保护家庭的责任，以实现家庭在新时代所担负的传承优秀法律文化、稳定婚姻家庭关系、实现儿童权利优先、弘扬婚姻家庭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夫妻财产法上的个人主义原则应受保障夫妻共同体这一价值的限制。家庭关系中的利他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互利的行为——在一方需要的时候进行帮助，在

自己需要的时候得到回馈，如果父母只从利己及子女的角度行事，对方也会作出同样的回应。如果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充斥着利己和算计，家庭的亲密关系也将不复存在，父母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心愿也会成为泡影。在个案中看似维护出资父母的财产权益，但“司法解释既然可以作为一种裁决依据，同时它应该可以作为一种行为依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基于上述考虑，将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落实到具体规则设计中，通过肯定双方对家庭的付出，免除其后顾之忧，从而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

其次，还应当解释论背景下研究法律的适用。《民法典》第 1062 条、第 1063 条和第 1065 条确立了我国基本的夫妻财产制度。据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原则上为夫妻共同财产，除非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只归一方。基于中国人含蓄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维护和谐的家庭关系需要，父母在为子女出资购房时，往往没有明确的赠与合同，更少明确约定只归自己子女一方。因此，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赠与夫妻双方。那么，能否将不动产登记情况视为双方明确约定的情形？

笔者认为，该规则虽然清晰明了，且登记在很多情况下能够间接表达父母的意愿，但也应当看到，以登记为判断标准一方面，容易降低家庭共同体认同感、伤害夫妻感情、影响家庭和谐；另一方面，家庭情况千差万别，针对基于各种考虑将房产登记在双方名下甚至子女配偶名下的情况，如果将登记和赠与意思表示挂钩，认定为无条件赠

与夫妻双方，可能与当事人的本意不符。实践中，正因如此推定，导致出资一方父母认为自己利益受损，转而以该出资款项系民间借贷为由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使得问题更为复杂，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此问题的根源仍在于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如何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给子女购房出资款项的归属。基于父母与自己子女利益的一致性，只要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确定相关规则，即可实现对父母权益的保护。一般情况下，父母在子女婚后为其购房出资有默示的意思表示基础，即该赠与是以子女的婚姻稳定存续为前提，司法实践中应特别考虑该法律行为作出的意思表示基础。为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不再将不动产登记和赠与的意思表示推定挂钩，而是根据不同出资情况和来源，区分两种情形进行规定：

1.在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情况下，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应当按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该出资无论是否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在根据《民法典》第 1062 条和第 1063 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民法典》第 1087 条的规定合理分割，即在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财产的具体情况”应当包括出资来源情况。在具体分割时，考虑到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而房产的价值较大，又无法进行实物分割，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同时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

额。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便父母明确约定该购房出资只给予子女配偶一方，基于血亲与姻亲关系的差别，一般情况下，该约定也是以子女婚姻关系存续为默示的意思表示基础，在子女离婚时，也需要考虑。

2.在双方父母对房屋均有出资或一方父母部分出资的情况下，也应采用相同思路，即以出资来源和比例作为分割的基础，同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但在具体分割时，考虑到此种情形出资来源和出资比例的复杂性，无法明确房屋归哪一方所有，需要根据个案情况分别处理。比如，双方父母的出资比例为 2：8，如无明确约定，夫妻对该房产并不是按份共有，而是共同共有。这也与《民法典》第 308 条关于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的，应视为共同共有的规定精神一致。在无其他特别因素的情况下，具体分割时，一般可以判决房屋归 80% 出资比例的一方，但是并非一定给另一方 20% 的补偿，需要在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等事实的基础上，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补偿比例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 20%。此种“软处理”的方式符合婚姻家庭的伦理性和利他性特征，可以在保护个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家庭团体性之间实现适当平衡，有助于增进另一方对家庭的认同感和婚姻凝聚力，也不违背父母一方的初衷。在婚龄较短的情况下，亦能够保障出资父母一方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引导当事人从过多地关注登记情况，转向更多地关注对家庭的付出。此外，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4 条第 3 款的规定，赡

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在其已经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下,给予其一定补偿,亦能够有利于保障老年人权益,实现家庭和睦。

二、平衡保护夫妻财产关系与第三人交易安全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婚姻家庭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个人流动性提高与社会分工专业化导致传统大家庭逐渐解体,家庭关系的范围逐渐缩小至核心家庭,并成为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元。在家庭关系之中,夫妻团体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是家庭与社会相互联系的路径。另一方面,家庭的社会职能大大减缩。传统家庭在诸多方面呈现去功能化的趋势,如生产、经营活动就由效率更高的市场或其他组织取而代之。家庭逐步失去其生产的功能。此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又替代了原有家庭的部分功能。夫妻团体主要是因为人的原因而不是功能的原因聚集在这一处所。

个人作为独立个体对外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对内身份仍为家庭成员。故而,在家庭中的个人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夫妻之间以“伦理人”的身份对内营造家庭共同生活,适用以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护弱势群体等为原则的家庭人身法规范;另一方面,夫或妻又以“经济人”的角色对外参与社会经济生活,采用以私法自治为圭臬、具有高度形式理性化的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等一般财产法规则,资源和财富由此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形成“系统循环”。因此,在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时,既要注意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规定解决内部关系,又要注重婚姻家庭与外部市场经济的联系,平衡婚姻家

庭外的第三人与婚姻内配偶的利益，平衡市场的交易安全与婚姻的实质正义。既不能简单以婚姻家庭受特殊保护为由消解外部的财产法规则，也不能不考虑外部关系对家庭的影响，以免破坏家庭的伦理基础。以下举两例说明。

（一）夫妻一方擅自处分自己名下股权的情形

针对实践中存在争议的夫妻一方擅自处分自己名下股权的问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9 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这涉及夫妻一方对外从事生产经营行为时如何维护股权登记公信力、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与保障配偶另一方合法权益的平衡。具体分析时应区分内外部关系。在夫妻关系外部，股权转让这一商事行为受公司法调整，股东个人是公司法确认的合法处分主体。在出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权转让的情况下，相对人通常不将出资人或转让人是否已婚还是未婚作为交易考虑的因素，何况当事人的婚姻状况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故婚姻状况一般不应影响股权的认定和转让。如果要求交易相对方、共同发起人或者公司审查某一股东的婚姻状况，不仅有可能侵犯其个人隐私，也不当地增加了交易成本。从现行公司法规定来看，除了股权继承涉及身份关系认定外，公司法并没有将出资人的婚姻状况作为考虑因素。

股权是股东因出资行为而对公司享有的获取经济利益和参与公

司经营管理的各项权利的总称。一般认为，股权属于复合型权利，既包括自益权，也包括共益权。而取得股权不仅包括实质要件（出资或者基于受让、继承等），还包括形式要件（通知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进行工商登记）。“基于出资让渡的财产权转化为公司独立财产权后，获得的对价（股权）可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畴，由夫妻共同所有。”《民法典》第 1062 条在修改原婚姻法时将“生产、经营的收益”改为“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股权在范围上应当可以被“投资的收益”所涵盖。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包括夫妻一方或者双方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的各种收入和投资所得的收入，有劳动收入，也有资本收益，如股票债券收入、股份、股权等资本利得，亦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种形式。

在夫妻关系内部，应当受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处理权规定的制约。在此情况下，显名方未经未显名配偶一方同意所作处分应解释为无权处分，以保护实际出资财产的共有人的利益。但基于股权行使场合不同，应在不同法律关系项下具体分析，即便认定为无权处分，也是从与实际出资人以及股权受让人的关系角度而言的。在与公司关系层面，根据《公司法》第 56 条第 2 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法》第 86 条第 2 款规定：“股权转让的，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只有在股东名册上登记的股东才能向公司主张权利，股东配偶不能以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为由，向公司主张权利。

民法典在删除原《合同法》第 51 条关于无权处分规定的基础上，

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2〕8号，已修改）第3条的规定，在买卖合同一章增加第597条第1款，即“因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这表明无权处分不再影响合同本身效力。因此，不论是否认定构成无权处分，均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区别在于股权是否能够发生变动。司法审判的关注重点应是该交易是否属于正常的商事交易，是否损害了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而不能简单地要求所有交易都“共签”来体现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

“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有权处分和无权处分的事实认定有时并非泾渭分明，司法审判需要以妥善平衡双方利益为目标。在此情况下，司法裁判的视角不在于逻辑推演登记方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而在于如何在具体个案中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实质损害了未显名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进而平衡保护双方利益。”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受让人与出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出让人配偶合法权益的，该配偶有权根据《民法典》第154条的规定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比如，夫妻双方在离婚诉讼期间，一方将其名下股权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其父母、兄弟姐妹等近亲属，且不能进行合理说明的，一般可以认定存在恶意串通情形。

在夫妻关系内部，正常的股权转让所获得的对价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不损害配偶另一方的利益。如果一方有恶意转移、隐匿、挥霍转让对价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另一方不仅可以依据

《民法典》第 1066 条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 1092 条的规定，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该方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发现有相关行为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二）夫妻双方均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情形

再比如，针对夫妻双方均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情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10 条规定：“夫妻以共同财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均登记为股东，双方对相应股权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离婚时，一方请求按照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章程记载的各自出资额确定股权分割比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当事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此种情况下，同样应区分内外部关系。

在夫妻关系内部，出资的财产属于夫妻共有，相应地，作为对价所获得的股权无论登记在一方名下还是双方名下，亦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章程登记的持股比例可能基于公司经营管理等方面考虑，并无财产约定的本意，不能当然得出在婚姻家庭维度该登记即为夫妻约定财产制，除非双方对此另行明确约定。根据《民法典》第 1065 条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避免发生纠纷”。夫妻约定财产制不仅涉及夫妻双方的利益，还涉及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股权收益归属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维度内，不能当然根据对外公示的登记信息，

确定内部权属分配，而应当按照《民法典》第 1087 条关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进行处理；但是，在夫妻关系外部或者说在公司经营管理层面，不考虑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双方应当按照企业登记的持股比例各自行使管理权。

三、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与尊重家庭伦理

财产法上的人是“理性人”，财产法规范通过赋予个人权利，使个人能够按照自由的意志实施法律行为，并以自己责任承担既定的法律后果，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以及过错责任原则是其基石。在规范的整体体系上，财产法更为形式理性化和实证化，更具统一性。由于形式理性化的法律未参酌外在实质的价值（如伦理、功利规范），因而极大促进了法律的可预测性，成为保障个人追求自我目的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是，近代家庭关系与伦理、道德、习俗等因素之间具有的极强外部牵连性，以及家庭内部的不平等状态，致使家庭法难以如同财产法那样进行高度形式理性化的分析与建构，以保障商业交易中的可预期性。因传统道德、习俗与宗教教义所具有的强大惯性，家庭关系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超实证法的特征，并不完全属于法规范。婚姻是使双方人格同一化而形成的伦理实体，其不能被降格为相互利用的民事契约形式。即使婚姻被学者视为契约（身份契约），其与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目的契约”也具有本质的差异。因此，在婚姻家庭领域，不宜适用商品交易法则和计算理性。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一方面是基于婚姻家庭的私密性特征，另一方面主要因为婚姻以感情为基础，家庭并非按照千篇一律的既定

规则生活，而是各有各的相处之道。因此，婚姻家庭纠纷的规则设定不宜适用整齐划一的标准，而应更框架化、实质化，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根据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婚姻家庭的规则更多是指引性的，通过规则设定引导家庭成员共同努力，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通过每个人的利他行为，最终实现家庭共同体利益最大化，每个人也由此实现人格的完满。而如果一味适用财产法规则，看似规则清晰、最大化保护个人利益，其结果可能是仅算计自己的利益得失，而不愿意为家庭共同体投入，最终损害个人利益。尤其是家庭破裂所导致的未成年子女稳定成长环境的破坏，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对每个家庭至关重要，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

其中一类重要的纠纷情形是夫妻间给予房产问题。男女双方基于婚姻给予房产的情况在实践中非常普遍，目的也不尽相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 [原《婚姻法解释（三）》第 6 条] 将该情形引入民法典合同编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实际上承认了在赠与财产权利未转移前，赠与方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这可能带来两种失衡情况：一是受赠方与赠与方长期共同生活，仅是未办理过户登记，如果认可赠与方的任意撤销权，实际上损害了另一方的信赖利益；二是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后很短时间内，受赠方即提出离婚，在赠与合同制度下，赠与方除了法定撤销权，没有其他救济手段，但是法定撤销权有法定的适用情形，很多案件事实并不满足该条件，此种情况下如果不支持其返还或者部分返还的诉讼请求，对赠与方是不公平的。关

于该问题，理论界争议较大。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5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区分未办理转移登记和已经办理转移登记两种情形分别予以规定，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其中《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5 条第 1 款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第 2 款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1.关于夫妻间给予房产约定的性质。从实践看，夫妻间给予房产主要是针对该特定财产权属的认定，双方的本意并非建立替代法定财产制的约定财产制，没有整体上对婚前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进行约定的意思，尤其对契约成立之后的财产关系不产生一般性和普

遍性的约束力。因此，该约定应属于广义的夫妻一般财产约定，而不属于狭义的约定财产制。但是，基于《民法典》第 1065 条规定的宽泛范围，该情形不妨受到《民法典》第 1065 条规范。在法律适用顺序上，根据《民法典》第 464 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应当首先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只有在婚姻家庭编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规定。因此，不能舍弃婚姻家庭编的特别规定而直接适用合同编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即应当认定该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也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家庭领域的体现。

2.要特别关注夫妻间给予房产这一法律行为的基础。夫妻间给予房产行为虽看似无偿，但实际上存在默示的交易基础，除双方明确约定该给予不受离婚影响外，不宜将合同性质认定为赠与合同，而应认定为一种无名合同。当事人不能依据赠与合同规则，以财产权利未转移为由行使任意撤销权。该交易基础通常是为了建立或者维系、巩固婚姻家庭关系，增进双方感情和婚姻家庭凝聚力。在离婚的情况下，该交易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应当考虑该变化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特定情况下对合同严守规则予以突破，既“尊重个人对自己生活的自治安排”，同时也要保护家庭弱势成员，维系家庭良善底线。

德国判例中发展出的“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对我国处理此类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德国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即使客观上没有对等给付，通常也不会将配偶间给予定性为赠与关系，而是将

其认定为“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而不适用赠与法。根据判例中的观点，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产生于默示或推定成立的家庭法合同，婚姻的存续即为此类合同中的交易基础。也就是说，配偶一方对另一方的给予受合同支配，该合同中的给予并不是无偿的，而是配偶双方共同生活的结果。根据联邦普通法院的见解，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的成立条件是：配偶一方以结婚为目的，或为了实现、安排、维持或保障双方的婚姻共同生活而给予另一方财物；同时给付人设想或期待婚姻共同生活将继续存在，并且其在此共同生活框架下对该财产及其孳息有共同权利，此种期待或设想就是给予的交易基础。婚姻破裂，意味着交易基础的丧失。上述思路与我国现有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契合点应是《民法典》第 533 条的情势变更制度。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势变更制度以追求实质正义为目的，这与婚姻家庭的基本理念相吻合，有可以类推适用的基础。夫妻财产约定虽系身份行为的附随行为，但若情势变更规则的适用有利于实现家事法维护婚姻家庭的目标，二者在性质上不存在冲突。因此，在夫妻间给予房产推定存在默示交易基础的情况下，基于离婚导致交易基础的重大变化，可以参照适用情势变更制度予以调整，以实现实质正义。

3. 基于婚姻家庭的伦理性和利他性特征，确定调整合同需要考量的因素。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上述考量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一般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同时，根据上述考量因素确定是否由

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长，接受方无重大过错的，虽然房屋未办理转移登记，也可以基于双方约定，在内部关系上认定给予方应履行约定，将房屋转移登记给对方，当然可以考虑婚姻关系具体情况，由接受方给予合理补偿。因为离婚财产分割是对现有财产的分割，考虑到房屋市场价格存在变动，以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作为参考标准，比较公平合理。对于已经转移登记的，原则上，应当保护接受方的合理预期，不宜随意通过司法手段强行干预。但是，该给予行为一般是以婚姻存续、双方长期稳定共同生活为默示的基础，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的，若维持该给予行为，则会导致双方利益显著失衡，对此予以适当调整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义。如果双方明确约定是单纯的赠与，不依附于婚姻关系而存在，则可以按照赠与合同规则处理。判定是否系纯粹性赠与的主要依据在于，双方是否明确表达了该给予独立于婚姻关系的意愿，即赠与在离婚情形下仍然有效。

四、婚姻家庭关系中体系化适用民法典各编的规定

婚姻法回归民法体系后，在考虑其身份法特性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其与民法典其他各编的体系化解释，实现民法典内在逻辑统一。法典化就是体系化，婚姻家庭法入典后，要从单行法思维向法典化思维转变。由于婚姻家庭编已经与民法典其他编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必须以体系化视野准确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以维护家庭和谐有序，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该思维体现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中主要有以下几项具体规则：

（一）离婚协议参照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

《民法典》第 1064 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加大了对配偶一方权益的保护力度。根据该条规定，如果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原则上应被认定为个人债务。在此情况下，有的夫妻双方通过解除婚姻关系，借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将所有财产分配给非举债的配偶一方，而将债务留给自己；如此，举债的配偶一方名下无任何财产，而原配偶依离婚协议所分得的财产又非举债方的责任财产，债权人便因此无法得到清偿。一般而言，“只要行为人履行其家庭法上的义务而给付财产，这种财产给予不能认定为《民法典》第 538 条规定的‘无偿处分财产权益行为’，不能成为债权人撤销权的对象。虽然此时债务人的行为可能在形式上导致其责任财产减少，但这种减少受法律的特殊保护，其根源正是家庭法中的利他主义假设。”但是，不能因为离婚协议属于婚姻家庭法规范而认为其完全与外部无任何关联，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审判实践中，夫妻之间为逃避债务，通过离婚协议的方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并不鲜见，这无法通过婚姻家庭法内部规则解决，只能在外部寻找解决途径，即涉及债的保全问题。但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私密性特征，债权人很难了解夫妻财产分割协议的具体内容，如何平衡保护双方利益，成为理论和实践中的难题。为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基于体系解释思维，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538 条和第 539 条规定，将离婚协议纳入债权人撤销权范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3 条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

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或者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1.将离婚协议纳入债权人撤销权制度适用范围，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制度目的和离婚协议的性质。民法典针对债务人诈害处分其责任财产的行为，按照有偿和无偿两类情形分别规定了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行为的一项民事权利。”债权人撤销权是债的保全制度之一。根据《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规定。考虑到离婚协议虽以身份关系为基础，但目的不是维持身份关系而是解除身份关系，其中的财产处理条款更多地体现财产性质，因此，在婚姻家庭编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有参照适用合同编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基础，以避免夫妻通过离婚损害债权人利益。

2.离婚协议纳入债权人撤销权行使对象应为参照适用，而非直接适用。所谓“参照”，即指某一法条在其构成要件或法律后果中指示参照其他法条，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参照法律要件，另一类是参照法律后果，且即使制定法没有明确规定，被指示参照的法规范之适用，始终只能是“相应地”适用。应避免不合事理的等量齐观，即事物或

者说被调整的生活关系自身固有的差异所要求的差异化处理不应当被排除。对参照适用型引用性法条/准用性法条,“一直必须注意系争两个法律事实间之特征上的差异,并针对该差异,慎重地认定拟处理之案型是否有限制或修正拟准用之法条的必要”“参照适用型法条主要是从法律后果上参照适用”。

在将离婚协议参照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时,要考虑家庭法与财产法的不同。如果是正常的离婚协议,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约定,另一方取得属于自己的份额,虽然形式上没有表现为支付对价,但并不是无偿取得,只是取得自己应得的部分,因此,债权人原则上不能根据《民法典》第 538 条规定请求撤销。法律调整的是双方不合理的财产分配,使得作为债务人的配偶一方责任财产减少,进而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此种情况下,债务人诈害债权的意图有时较难判断,债权人撤销权涉及债权人债权保护、债务人离婚及处分财产自由和债务人配偶一方利益的平衡保护,应更为慎重。夫妻离婚财产分割不同于市场交易,不存在相对确定的交易价格,无法准确确定“不合理”的区间范围,此时,在参照适用时应当考虑离婚协议的特殊性,不宜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 号,以下简称《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42 条和第 43 条的规定。

夫妻离婚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如无特殊情况,一般是各自一半,但这只是理想状态,且不说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多样性,基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进行实物分割时,往往难以做到价值绝对相同,

即使根据《民法典》第 1087 条规定，还需考虑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进行适当调整。实践中的情况更为复杂，离婚协议可能基于子女抚养、一方存在过错等因素，导致一方多分、另一方少分的情况。因此，在参照适用时，不能简单认为只要不是平均分配就符合《民法典》第 539 条规定，而应当综合考虑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是否存在离婚经济帮助、家务劳动补偿或者离婚损害赔偿等事实，基于婚姻解除的实际情况严格把握撤销标准，以免损害另一方和未成年子女利益。兼顾对债权人和配偶另一方尤其是妇女、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平衡保护，既遏制道德风险，又为家庭利他主义留有法律空间。当然，支持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请求的前提应是相关债务被认定为夫妻一方债务。如果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则任何一方的所有财产均为责任财产，债权人对撤销离婚协议没有诉的利益，一般不应予以支持。从利益衡量角度分析，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已能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没必要再牺牲夫妻之间离婚后果的稳定性。

（二）离婚协议约定财产给予子女参照适用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制度

离婚是婚姻解体时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清算过程，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是离婚协议中的重要内容。实践中，基于共同财产难以具体分割、各方对共同财产价值无法协商一致等原因，很多夫妻选择了折中的办法，即将共同财产的部分或者全部给予双方共同的子女，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之所在，较容易达成一致。但是，离婚后，该财产的实际占

有一方或登记一方拒绝履行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其甚至以享有任意撤销权为由主动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协议。对此，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父母将财产无偿给予子女，应为赠与法律关系。根据《民法典》第 658 条规定，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另一种观点认为，离婚协议是以解除身份关系为基础的，是一揽子的整体协议，各部分之间虽相互独立，但存在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关系，甚至一方当事人之所以做出离婚决定，恰恰是考虑对方同意将财产给予共同子女，尤其是在该子女由其直接抚养的条件下。因此，另一方不享有任意撤销权。《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采纳了后一种观点。

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处分的约定，实际上是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的具体形式，且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等约定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单独撤销其中一部分内容。即便认为该财产是对子女的赠与，也是夫妻共同赠与，在财产权利没有转移前，一方亦不单独享有任意撤销权。因为双方共同赠与的标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该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亦不宜认定一方可以享有一半的撤销权。为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69 条第 2 款规定：“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以及债

务处理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登记离婚后当事人因履行上述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既然该协议对夫妻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根据《民法典》第 577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另一方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如果不履行一方已经将财产处分且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另一方可以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违约责任。为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子女能否直接请求不履行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考虑到离婚协议的主体是夫妻双方，子女并非合同主体，将特定财产给予子女更多的是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折中处理方案，实际系夫妻分割共同财产的方式之一。如果夫妻协商一致变更原处理方式，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应予尊重。故原则上不应直接赋予子女请求权。但是，实践中，如果夫妻双方有此需求，希望赋予子女请求权，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522 条第 2 款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制度。“真正的利益第三人合同结构是基本合同加第三人约款。在第三人约款中，债权人与债务人特别约定，债务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如果合同当事人仅是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没有赋予第三人履行请求权的，不属于本款规定的真正的利益第三人合同，可以按照本条第 1 款规定的不真正的利益第三人合同处理。”

为满足双方意思自治需要,《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20条第3款规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子女可以就本条第一款中的相关财产直接主张权利,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子女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由该方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真正的利益第三人合同的法律效果应限于在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但毕竟其不是合同当事人,仅是基于法律规定或者通过合同当事人特别约定获得有限的权利,该权利来源于明确规定或约定,并不是完整的合同当事人权利,不能当然推导出享有合同当事人的解除权或者撤销权等权利。“一般认为,第三人对债务人虽取得履行请求权,但由于其不是合同当事人,合同本身的权利,如解除权、撤销权等,第三人不得行使。”

五、维护公序良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亲属之间的身份关系以人伦秩序为基础,婚姻家庭领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场域,有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空间。萨维尼曾指出,家庭包含了三种不可分离的统一状态,即自然的形态、道德的形态以及法的形态,家庭关系只是部分具有法的性质。国家可以通过否定法律行为效力的方式介入婚姻家庭关系,其中否定法律行为效力涉及最多的依据即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为维护公序良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在以下两方面予以重点回应。

（一）重婚不适用效力补正

《民法典》第 1051 条将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重婚行为认定为无效婚姻。因《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10 条规定，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在提起诉讼时已经消失的，婚姻效力可以补正。对此，存在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如果提起诉讼时原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的，也属于无效婚姻情形消失的情况，应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自合法婚姻当事人离婚或配偶死亡的节点开始，重婚行为效力可以自动补正，这样可以减少当事人再次结婚登记的行政成本。但是，从公序良俗的角度，重婚行为与未达法定婚龄以及原婚姻法规定的“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情况在违法程度上存在轻重之分，前者违反的是公益要件，后者违反的仅是私益要件。因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明确重婚行为不适用效力补正。该司法解释第 1 条规定：“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请求确认重婚的婚姻无效，提起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被告以此为由抗辩后一婚姻自以上情形发生时转为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违反公序良俗的赠与应全部返还

近年来，婚姻家庭领域中较为常见的纠纷之一是因“婚外情”赠与财物产生的纠纷，相关案件量呈上升趋势。审判实践中，赠与纠纷在行为性质、效力认定以及返还财产比例等方面的裁量标准迫切需要统一的规则。为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7 条第 1 款

规定：“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处理。”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认定合同无效的路径主要是违背公序良俗。“婚外情”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夫妻忠实义务，也严重违背公序良俗。鉴于民法典修改了原合同法的规定，处分人无处分权不再影响合同效力。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广义上的无权处分，在解释上亦不能因此否认合同效力。因此，在路径上应当解释为双方基于维护“婚外情”的目的赠与，该目的违背公序良俗，依据《民法典》第 153 条第 2 款规定，该民事法律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其次，相应的法律后果应根据《民法典》第 157 条规定确定。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如果原物已转让他人且他人构成善意取得等不能返还的情况下，应当折价赔偿，同时，有过错的一方还要赔偿对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最后，该情况不仅包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包括离婚后。无论是在离婚前还是离婚后，当事人处分的均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不分份额地对该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而非每人享有一半的所有权。而且，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基于出轨一方存在过错，财产并非平均分配，出轨一方可能不分或少分财产。因此，另一方有权要求全部返还。

（文章发表于《法律适用》2025 年第 1 期“专题研究：聚焦‘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栏目，第 27-44 页。因文章篇幅较长，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

继父母子女关系中的若干实践问题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5 年第 1 期 作者：王丹）

近年来，随着离婚率上升，再婚家庭增多，继父母子女关系认定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务的关注。再婚家庭的不稳定性也进一步导致相应的问题更为复杂。其中的问题包括继父母子女间关系与典型拟制血亲关系是否存在不同；继父（母）与生母（父）离婚后，继父母子女关系是否当然解除；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后，年老的继父母在离婚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时，能否要求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给付生活费，等等。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称《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予以回应。本文结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其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

有关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规范梳理

继父母是指子女母亲或者父亲再婚的配偶；继子女是指夫或妻一方与前配偶所生的子女。继父母和继子女的关系是因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再婚而形成的，即生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再婚，或者生父母离婚，生父或者生母再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律对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可追溯至 1950 年《婚姻法》，该法第 16 条曾规定，夫对于其妻所抚养的与前夫所生的子女或妻对其夫所抚养的与前妻所生的子女，不得虐待和歧视。该条改变了旧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影响下继子女社会地位低下、受人歧视、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现状。该条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继子女”的

概念，但是在立法中第一次明确了继子女的法律地位。

1980 年《婚姻法》出现了“继父母”和“继子女”的概念，第 21 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该法明确规定了继父母与继子女间双向的权利义务内容，更为全面。2001 年《婚姻法》和《民法典》均沿用上述规定，仅作部分文字修改。“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法律中有关继父母和继子女的规定是行之有效的，所以，这次编纂民法典没有对现行法律中有关继父母和继子女的规定作出改动。”

在现实生活中，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名义型。这种情形主要是指生父或者生母与继母或者继父再婚时，继子女已经成年并能够独立生活或者继子女虽未成年，但是由生父或生母的另一方抚养，未与新组成的家庭共同生活，继父母没有抚养教育继子女。此种情况下，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纯粹的姻亲关系，继父母对继子女不享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义务，继子女对继父母亦无赡养扶助的义务。

其二，收养型。这种情形主要是指继父或者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正式办理了收养手续，将继子女收养为养子女。此时，该子女与共同生活的生父或者生母之间的关系仍为直系血亲，而与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生父或者生母另一方的父母子女关系随之消灭。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鼓励继父母收养继子女，并通过这种转化来调整继子女

和继父母的法律关系。我国 1991 年《收养法》第 14 条就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可以收养继子女，并可以不受该法第四条第三项、第五条第三项、第六条和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该规定一直沿至民法典，基本立法精神未改变。此种情况下，继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内容按照收养关系确定。

其三，共同生活型。这种情形主要是指生父或者生母与继母或者继父再婚时，继子女因尚未成年而随生父母一方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时，继父或者继母对其承担了部分或者全部抚养教育义务。《民法典》1072 条第 2 款即是规范此种情形，明确“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在此情况下，继子女与生父或生母的关系仍然存在，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并不消除。因此继子女具有双重法律地位，享有双重权利，负有双重义务。此与收养型不同。但是，在姻亲关系解除时，双方之间又不能完全适用自然血亲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比如，不能按照《民法典》第 1084 条规定，在生父或者生母与继母或者继父离婚后，仍然认定继父母对继子女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權利和义务。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法发〔1993〕30 号）第 13 条曾规定，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母抚养。该规定也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2 号，以下称《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保留。

第三种类型因为涉及对抚养教育事实的认定以及“适用本法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具体内容，最为复杂，实践中争议最大，本文主要以该种类型作为研究对象。

对继父母子女间为拟制血亲关系的反思

我国理论界多数意见认为，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之间为拟制血亲。“已经形成拟制血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并不会因为继父母与生父母离婚而消灭。易言之，形成的抚养教育关系独立于生父（母）与继母（父）的婚姻关系。”继父母子女关系转化为特殊的拟制血亲关系，其权利义务关系与一般亲生父母子女关系无异，故其法律关系不因生父母婚姻的终止而自然解除。但也有学者认为，《婚姻法》（2001 年修正，已失效）第 27 条的规定不足以作为认定有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之间构成法律上拟制血亲的依据。

即使持拟制血亲观点的学者，也认为我国继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规定存在弊端并提出了诸多完善的措施。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与收养不同，此种关系无法进行登记，且有赖于法院对抚养教育事实进行确认。为明确和稳定身份关系，不宜承认双方协议的解除效力，必须进行司法确认。按此观点，继父母子女关系不能协议解除只能诉讼解除，比解除收养关系还要严格，这就更进一步加重了继父母子女关系之间的负担。但是，民法典编纂时并未采纳相关建议，仍然延续了原《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未作修改。因此，需要在解释论的视角下，对《民法典》1072 条作出妥当解释，为实践中处理相关纠纷提供依据。

笔者认为，生父母与子女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关系，这种基础决定了生父母对子女是第一位的亲权关系，而继父母与继子女是基于姻亲关系而发生的一种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两种关系存在本质不同。主要以姻亲关系为基础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应更关注其“附随性”，即继父母子女关系是附随于生父母的姻亲并以事实生活为基础的。《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不能当然推导出已经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为拟制血亲。理由如下：

1.拟制血亲指的是本无血缘关系，法律拟制其具有与自然血亲同等权利义务的亲属。拟制血亲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是与自然血亲相对的一个概念，其建立的人身权利义务关系应与自然血亲无异。如果仅因为继父母子女之间存在抚养教育事实就认定形成拟制血亲关系，实质上就是将纯粹事实作为拟制血亲关系的形成依据，而无须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和程序，缺乏与构建拟制血亲关系相匹配的要式规定。

2.继父母子女间产生父母子女权利义务的前提是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了抚养教育。而继父母对未成年继子女进行的抚养教育并不是一种法定义务，可以说，即使继父母不抚养教育继子女也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可见，如果按照拟制血亲说，就会产生基于抚养教育事实产生抚养教育义务的悖论。此时，对于继父母来说，其行为的导向就是尽量不去抚养教育未成年继子女，以免去其后负担的义务。这样反倒不利于再婚家庭的和谐稳定，违背立法初衷。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继父母多是出自于夫妻感情和维护婚姻家庭的和睦抚养教育继子女，

而不是基于履行义务的自觉。

3.与典型的收养拟制血亲关系相比,虽然《民法典》第 1111 条也同样规定了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但其适用的范围与继父母子女关系显然是不同的。而且,该条还同时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灭;而继父母的近亲属与继子女间不因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教育而发生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4.依抚养教育事实认定拟制血亲关系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漠视。

《民法典》第 5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婚姻法回归民法体系后,应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贯彻该原则。在继父母与继子女间建立拟制血亲关系,涉及双方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重大身份利益,应当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素。

继父母接纳继子女共同生活或者进行抚养教育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其愿意在将来继续承担该义务。继子女被抚养教育时尚未成年,处于被动状态,无法推定其法定监护人同意该子女与继父母建立父母子女关系,亦无征求 8 岁以上未成年继子女意见的程序设计。若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仅凭继父母单方实施的抚育行为便强行认定拟制血亲关系,有违意思自治原则。考虑到现行法律关于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不需要意思表示要素,因此,不宜特别强调其“独

立性”。如果双方期望产生拟制血亲效果，可以根据《民法典》第 1103 条的规定通过收养实现。

5.实际上，即使认为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间为拟制血亲的观点，也均承认，其与以收养为典型的拟制血亲存在重大差别。而在认定为拟制血亲的前提下，对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继承、赡养等问题的处理又脱离了拟制血亲的框架，存在矛盾结论。比如，继父母已抚养教育继子女，但继子女未履行赡养义务，而继父（母）与生母（父）已经离婚多年再无往来的情况下，能否认定继子女对继父母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如果认定为拟制血亲，则该血亲关系独立于继父（母）与生母（父）的婚姻关系，不因该婚姻关系解除而自然终止，逻辑上只能得出继子女享有法定继承权的结论。但从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看，该结论一般并不符合继父母的本意，有违朴素正义，为此又必须通过其他解释对结论进行修正，修正结果又与拟制血亲的认定存在矛盾，难以形成体系自治。

6.支持形成拟制血亲观点的一个论据是，这样有助于维护老年继父母的合法权益。对此，笔者认为，如果继父母与生父母婚姻关系一直持续，现实生活中，继子女通过照顾自己生父母亦可实现赡养目的，一般不会发生争议；如果生父母一方死亡或者虽未死亡但已与继父母分居，继父母在有自己亲生子女的情况下，一般也会依靠亲生子女赡养，成讼的案件很少。即便为保障老年继父母的生活，由受其抚养教育成人的继子女给付一定的生活费，亦可以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通过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1118 条关于收养关系解除后的相关

安排实现，并非必须通过解释为拟制血亲关系才能解决。此点与自然血亲存在区别：自然血亲并不一定总是遵循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即便生父母因为各种原因未履行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原则上亦有权要求成年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对《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的解释

在不认定为拟制血亲的论点下，如何贯彻实施好《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呢？

对此，笔者认为，《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的文义表述较为宽泛，需要结合立法目的，对该条进行限缩解释。《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的立法本意在于确认继父母子女之间业已形成的抚养教育事实，保障未成年继子女能够在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中健康成长，保护再婚家庭成员的合理期待。

但此目的有多种实现途径，将继父母子女关系认定为拟制血亲看似最为简单、直接，力度最强，但很多时候可能并不符合当事人本意，尤其是生父（母）与继母（父）离婚的情况下。拟制血亲与自然血亲间仍是选择的关系，而不宜采用并列关系，否则会导致身份关系混乱，引发权利冲突。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更为妥当的方式是对《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进行缩限解释，将其指向范围限于日常生活、教育方面，为继父母设立弱式意义上的辅助照顾权，在“抚养教育”范围内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相关规定，即足以保护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业已形成的事实关联，实现相关立法目的。具体而言，对该条“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

系的规定”的内容，需要进行逐项分析。

《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主要包括三项：其一，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權利和义务；其二，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贍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其三，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權利。具体分述如下。

（一）关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權利和义务

“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教育本身就是法律关系形成的基础，只有继父母事实上对继子女进行了抚养教育才可能形成这一关系。故而，继子女对于继父母本身要求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權利，也不能依据《民法典》第 1067 条的规定，要求其给付抚养费”也即，此中的逻辑基础是，因为抚养教育的事实行为，才采用拟制规范，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而不是因为双方有父母子女关系作为身份基础，依此身份基础才负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也正因此逻辑，《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 54 条才保留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意见》（法发〔1993〕30 号）第 13 条规定。根据该条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可见，在生父（母）与继母（父）离婚的情况下，不能适用《民法典》第 1084 条关于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保护權利和义务的有关规定。同样，《民法典》第 1085 条关于不直接抚养一方负担抚养费的义务、享有探望的

权利等，均不宜继续适用。

因此，对未成年继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權利和义务应以生活共同体存续为前提。如果婚姻关系继续，共同生活的事实未改变，则继父母确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该义务源于继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生父母建立了夫妻共同体。在共同生活过程中，作为生父母的配偶，必须要协助其完成抚养、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创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必要家庭环境基础，但应以姻亲关系以及共同生活事实存在为前提。

当然，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虽继父母对未成年继子女以抚养教育事实作为创设权利义务的基础，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不允许继父母通过拒绝抚养教育的方式促使该事实不成就，以逃脱相应的义务。继父（母）在与继子女生母（父）婚姻关系存续的共同生活期间，不能单方拒绝抚养未成年子女，即不能以终止共同生活事实的方式摆脱养育义务。只有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其才有选择权，否则将违反《民法典》1072 条的制度目的。

此外，如上所述，与收养不同，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教育并不会产生继子女与继父母的近亲属之间的法律关系，他们之间仅具有姻亲关系。故而，不适用《民法典》第 1074 条所规定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的抚养、赡养规则，也不适用《民法典》第 1075 条所规定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规则。

（二）关于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所谓“适用本法关于父

“子女关系的义务”主要是指适用成年子女对父母义务的条款，即《民法典》第 26 条第 2 款规定的“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义务”。根据《民法典》第 1067 条的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笔者认为，如前所述，建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在继子女受继父母抚养教育成人后，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继父母，可以要求该继子女给付一定的生活费，这原则上可以独立于生父（母）与继母（父）的婚姻关系，也不必然以继父母子女关系继续存在为前提。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1118 条规定，仍可以得出该结论，即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继父母仍可以要求受其抚养教育的成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

（三）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1.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适用

有观点认为，既然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那么按照《民法典》第 1070 条有关“父母与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的规定，即可推出已经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可以相互继承。该观点还可以《民法典》第 1127 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作佐证——“子女包括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笔者不同意该种推论。首先，从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原则角度考虑，在继承编对法定继承人范围有专门规定的情况下，

应当适用继承编的规定，而不宜越过继承编直接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规定。其次，从文字表述看，《民法典》第 1072 条仅规定了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并未规定生父（母）与继母（父）结婚时该子女已经成年、未受继父母抚养教育但赡养了继父母的情形。

可见，如果以此条为依据确定继承人范围，并不全面。而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如果对继子女进行了抚养教育的继父母死亡时，其遗产还能被未履行赡养义务甚至因为与继子女生父母离婚多年而未共同生活的继子女继承，亦很大可能违背其真实意愿。《民法典》继承编源于原《继承法》，在关于抚养的表述上采用了广义的抚养概念，即不仅包括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等的抚养，还包括“上对下”的抚养和“下对上”的赡养。

而婚姻家庭编中的“抚养”，仅是在狭义范围内使用。因此，笔者认为，在解释《民法典》第 1127 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时，应根据法条的文字表述、两款之间的关系以及继承法律关系的制度目的作出解释。鉴于继承编没有区分抚养的具体适用场景，对于每款中的“抚养关系”应根据被继承人的不同，作具体区分。

因继承主要是以血缘关系和配偶之间的身份关系为基础，同时兼顾弘扬互帮互助的价值观，而继父母子女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因此，对于第 3 款“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基于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应解释为在继父母为被继承人的情况下，继子女对继父母实际进行了赡养，更符合该条规定的制度目的；相应地，第 4 款中“有抚养关系的继父

母”解释为在继子女为被继承人的情况下，继父母对继子女实际进行了抚养为宜。而且，因继父母子女关系是以姻亲为基础，姻亲关系消除的，即使双方曾经存在扶养关系，继父母子女间亦不宜互相主张法定继承权。对曾经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和继子女，可以根据《民法典》第 1131 条酌情分配遗产，以达个案平衡。

2.“受其抚养教育”的认定

关于“受其抚养教育”的认定，我国立法对认定标准未有规定，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实践中亦有较大争议。

一方面，对于何为“抚养教育”，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继父母与继子女共同生活，并且继父母负担了继子女全部或部分的抚养费，才能认定为“抚养教育”；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继父母与继子女共同生活，对继子女进行了生活上的照料，即可认定他们之间形成“抚养教育”的事实；还有的观点认为，即使继父母与继子女未共同生活，如果继父母负担了抚养费用，即应认定为形成“抚养教育”的事实。

另一方面，对于受其抚养教育的时间，也有不同观点。多数观点认为，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成立拟制血亲关系，不仅需要进行抚养教育，还要经过一定的期间。但是对于经过的期间有三年、五年、十年等不同观点。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在继父母子女的关系上，存在两种立法例：

（1）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做法。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为出发点，在其法律中，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产生权利义务的唯一途径是建立

收养关系，仅属于姻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是不受法律调整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往往并没有对继父母子女关系作出规定。

（2）俄罗斯及东欧等国的做法。基于维护子女利益的考量，在抚养关系中对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都有专门的规定。比如《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规定，如果继父母教育和抚养继子女少于五年，或如果他们未以应有的方式履行教育或者抚养继子女的义务，法院有权解除继子女赡养其继父母的义务。《罗马尼亚家庭法》规定，继子女的生父母死亡、失踪或贫困无力抚养时，继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而继子女对继父母有赡养的义务，以继父母尽义务在 10 年以上为限。

《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规定的有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本质上属于家庭法中的动态类型，需要进行动态判断。对是否形成抚养教育事实，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认定。所谓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意指“从物质上供养子女和在日常生活中照料子女，保障子女的生活，使子女得以健康成长”。所谓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则是指父母按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关心并教导、培育未成年子女，依法使其接受义务教育，人格得到全面发展。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2 条明确，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第 16 条则详细规定了家庭教育的具体内容。

为此，《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 18 条规定：“对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二条中继子女受继父或者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际进行生活照料、是否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予以认定。”对上述需要考虑的要素，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共同生活的事实。一般来说，共同生活事实是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形成身份上权利义务的必要事实。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共同生活是核心要素。《民法典》第 1072 条之所以规定一定条件下的继父母子女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即是以共同生活事实为基础。因此，继父母应当事实上照顾继子女的生活，参与继子女的教育。该条件原则上属于“一票否决”的必要条件。如果继父母与继子女没有共同生活，一般不应认定形成抚养教育事实。

当然，社会生活复杂多样，尤其在婚姻家庭领域，任何标准都不能绝对化，如果继父母因为工作等非主观原因未与继子女共同生活，但是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了持续的、较大数额的经济供养，也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认定为进行了抚养教育。当然，《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仅以抚养教育事实改变双方身份上的关系，而身份关系的有无对自然人影响甚巨，因此，在认定是否“形成了抚养教育”这一事实时，应当从严掌握。最基本的要求是共同生活应当具有一定时间的持续性。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不宜认定形成抚养教育事实。对于共同生活时间，如上所述，《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规定要求 5 年以上，该规定可以作为借鉴的考量因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继父（母）与生母（父）再婚时，继子女尚

未成年或者虽已成年但尚不能独立生活是双方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前提。如果继父（母）与生母（父）再婚时，继子女已经成年并且能够独立生活，即便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亦不属于《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规定情形，法律上双方之间没有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当然，道德上应倡导双方之间基于情谊，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共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在发生继承的场合，如果双方之间存在依靠对方扶养或者对对方扶养较多情形的，还可以通过《民法典》第 1131 条酌给遗产制度予以平衡双方利益。

第二，继父母承担了相应的抚养和教育费用。实践中，继父或者继母与未成年子女的生父（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般采用法定共同财产制。在该种情形下，虽然作为生父母一方，抚养未成年子女属于其法定抚养义务，但是，毕竟继父或者继母也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人，因此，不宜再强求继父或者继母需要额外用个人财产支付相关费用，才能认定为承担了抚养和教育费用。当然，如果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或者虽未明确约定分别财产制，但实际上双方财产各自独立使用，则如果继父或继母未使用自己财产给继子女消费，一般不宜认定为承担了抚养和教育费用。

但是，也要看继父或继母是否有负担能力，如果其没有个人财产或者个人财产较少，无法负担抚养教育费用，但在实际共同生活中进行了日常生活照料并履行教育职责，也可以认定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因此，虽然承担抚养教育费用是能否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并非绝对的必要因素。抚养教育事实认定的核心仍在于是否共

同生活并在共同生活中进行了日常生活照料和教育。依此逻辑，不宜在未共同生活的情况下仅以已经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了抚养教育费用为由，认定形成抚养教育事实。

第三，进行抚养教育应经过一定的期间。由于抚养教育的事实能够产生身份法上的若干法律效果，故需要该事实持续一定时间。这既是双方感情累积的必然要求，也是继父母子女间认可相互关系的外在表现，同时，持续稳定的事实亦能够对外产生一定的公示效果。

有观点认为，在认定是否形成抚养教育事实时，还要尊重继父母和继子女的意思。如果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已经互相明确表达了不成立拟制血亲的意思，那么即使双方共同生活、进行了抚养教育，也不宜轻易认定成立拟制血亲。笔者认为，该观点实际上正是拟制血亲观点的纠结之处，即按照拟制血亲的思路限缩解释《民法典》第 1072 条，增加意思表示要素，以试图缓解其中的矛盾，并同人们朴素观念相靠拢。对此，笔者认为，如果将继父母子女关系认定为拟制血亲，确须考虑双方意愿。身份行为属于民法法律行为，意思表示应为核心要素。作为重大身份关系变化，不考虑当事人意愿不符合身份行为特征。

但是，如前所述，《民法典》第 1072 条只是对业已形成的抚养教育事实的确认，该条并未要求双方有意思表示内容，如此解释恐有违法律本意。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基础，从第 1072 条条文表述看，“受其抚养教育”是事实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该条法律规定未强调需要考虑双方意愿。实际上，这也正是继父母子女关系不属于典型

拟制血亲观点的重要论据。也即，如果不认为该条可推导出双方成立拟制血亲，则不需要考虑当事人意愿。

抚养教育事实是认定双方适用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唯一条件，法律并未规定继父母或继子女的意思表示可以决定身份关系，而身份关系的成立需要法律明确规定。这也是拟制血亲说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而对于在何种情况下考虑双方意愿以及相应的法律效果，拟制血亲说亦没有进行具体说明。

笔者对此进一步分析如下：如果双方不同意成立拟制血亲的意思表示是在继父（母）与生母（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考量，应当不允许作出此种意思，因为此种意思表示不符合《民法典》第 1072 条的立法目的；但是，如果双方不同意成立拟制血亲的意思表示是在继父（母）与生母（父）婚姻关系解除之时，应当允许当事人作出此种意思表示，因为这已不涉及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更多是对身份关系的确认。而实践中，在继父（母）与生母（父）离婚时，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解除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因此，相关规则的设立应当更关注该普遍存在的心理预期。

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关系的解除

对于已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能否解除的问题，《民法典》延续了原《婚姻法》，未作明文规定。一般认为，继父母子女关系的终止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因继父母或者继子女一方死亡而终止；（2）协议解除。在继子女未成年时，经生父母、继父母协商一致，可以协议解除继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3）诉

讼解除。当事人要求解除已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裁决是否准予解除。

对于第二和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在继子女未成年的情况下，应以生父（母）与继母（父）离婚为前提。如果生父（母）与继父（母）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考虑到《民法典》第 1072 条系对人的一般性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其适用。为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在继父（母）与生母（父）未离婚的情况下，不宜允许与继子女共同生活的继父母通过协议或者诉讼解除的方式免除其履行抚养教育的职责。当然，如果继父母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利益行为的，可以撤销其监护权。继子女成年后，如果成年继子女与继父母关系恶化，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或者诉请法院解除的，应可解除继父母子女关系。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如果继子女的生父（母）与继母（父）的婚姻关系终止，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关系是自然解除，还是必须签有明确的解除协议或者诉讼解除，法律未作规定，实践中存在模糊认识。有的观点认为，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以生父（母）与继母（父）之间的婚姻关系存续为前提，但在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抚养教育事实后，他们之间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因生父（母）与继母（父）之间的婚姻关系解除而自然终止；另有的观点认为，如果继子女的生父（母）与继母（父）离婚时继子女尚未成年，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应认为继父母与继子女间拟制血亲关系解除，已经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采纳了后一种观点。其中第 19 条第 1 款规定：“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后，当事人主张继父或者继母和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继父或者继母与继子女存在依法成立的收养关系或者继子女仍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的除外。”笔者具体分析如下。

1. 已经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能否自然终止

这一争议的逻辑前提实质系是否认定双方成立拟制血亲关系。支持的观点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母与生父离婚后仍有权要求已与其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批复》作为论据。该批复明确：“尽管继母王某梅与生父李某心离婚，婚姻关系消失，但王某梅与李某景姐弟等人之间已经形成的抚养关系不能消失。因此，有负担能力的李某景姐弟等人，对曾经长期抚养教育过他们的年老体弱、生活困难的王某梅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该批复的理念系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应予以坚持。但即便认定双方不成立拟制血亲关系，亦能得出该结论，因此，将该批复作为支持拟制血亲说的依据不充分。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否解除的批复》曾认为，继父母与继子女已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自然终止，一方起诉要求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人民法院应视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准许解除的调解或判决。但是，该批复已经失效，而且，与《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 54 条规定的精神不一致。根据该条规定，在继父与生母或者继母与生父离婚时，继父母的单方

意思表示即可决定已经形成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是否终止，这实际上是认可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具有附随于生父母姻亲关系的性质，并非典型的拟制血亲。

如果认定为拟制血亲，则在生父（母）与继母（父）的姻亲关系解除后，继父母与继子女已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自然解除。若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多次再婚，就会产生多重拟制血亲关系，加之本身存在的自然血亲关系，则会演变成不同性质亲权之间的复杂冲突。继子女在法律上有多个父亲或母亲，不仅违反人伦常理，也会造成大量的权利义务冲突。为此，只能设置各种例外情形以平衡各方利益，这会使各项规则叠床架屋，不仅与实际生活不相符合，也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如果将《民法典》第 1072 条作限缩解释，不将其认定为形成拟制血亲关系，则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2. 身份关系认定应当符合现实生活实际情况

近年来，随着离婚率上升，再婚家庭增多，再婚家庭亦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以拟制血亲为由，强行司法干预，实际上并不利于相关纠纷的解决，反而徒增烦恼。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继父（母）与生母（父）离婚后，一般不会对继子女关系作出明确解除，继子女仍由生父母抚养，继父母不再与继子女共同生活。

这是婚姻家庭法学领域中“事实先在性”的体现。如果要求当事人必须通过明确的协议解除或诉讼解除，否则仍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不仅增加当事人诉累，而且实无必要，与现实情况亦不符。对此，

审判实践已经在尝试探索各种说理，以平衡双方利益。

比如在郑某 1 与郑某 2、郑某 3、郑某 4、郑某 5 法定继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继父母在离婚时要求生父母偿付抚养费，离婚后既不承担抚养费也不来往，足以表明继父母子女关系已经解除。在各地方高院的司法文件中，也有类似的尝试，比如江苏高院《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第 13 条规定，对于已经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因生父（母）与继母（父）离婚导致再婚关系终止的，如果继父母不同意继续抚养未成年继子女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可以解除，该子女应当由生父母抚养。

3.坚持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实际上，在已经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情况下，不同意继父母子女关系自然解除的观点，主要是考虑继父母已经进行了事实上的抚养教育，那么当其年老时，应当相应地享有请求赡养的权利。此种考虑有一定道理，但是正如笔者前已述及的，该保护目的并非必须在认定拟制血亲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从制度运行效率的角度看，应根据比例原则，以较小的成本实现相同的目的，即从制度设计上保障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继父母年老时的生活费请求权即可，没必要一定限制在身份关系前提下解决此问题。

故《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在原则上认定继父母子女关系因姻亲关系解除而自然解除的前提下，为平衡双方利益，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参照《民法典》第 1118 条关于收养关系解除后的规定，设置例外保护条款，即“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后，缺乏劳动能力

又缺乏生活来源的继父或者继母请求曾受其抚养教育的成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抚养教育情况、成年继子女负担能力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但是继父或者继母曾存在虐待、遗弃继子女等情况的除外”。

实践中还存在一类问题是，继父（母）与生母（父）离婚时，能否要求返还已经支付的抚养费。对此，笔者认为，即便认定继父母子女关系自然解除，也不意味着要溯及至再婚的婚姻成立之初，该解除应系“向后的解除”。在继父（母）与继子女的生母（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般实行的是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对于生父母一方来讲，抚养自己亲生子女为法定义务，作为经济上一体的夫妻，支付的抚养费很难分清彼此，故对已经自愿抚养继子女的继父母，离婚时，不宜支持其返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此外，对于共同生活的生父（母）死亡时，已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能否自然解除，实践中也存在不同认识。很多观点主张，基于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考虑，此种情况下继父母子女关系不能自然解除。继父母不得因未成年继子女的生父母死亡而停止对未成年继子女的抚养教育。如继子女的生父母另一方仍健在，要求将子女领回抚养的，要经继父母同意。双方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利益判决。若未成年继子女被生父母生存一方领回抚养，则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如果在生父母死亡时，继子女已经由继父母抚养成人，无论继父母子女关系是否解除，继子女都应对继父母尽赡养扶助义务。

笔者认为，与收养关系不同，继父母子女关系形成后，继子女与生父母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因此而消除。而且，基于血缘亲情，亲生父母的权利应优于继父母予以保护，那么此种情况下，亲生父母另一方要求将子女领回抚养，何以必须经处于劣位的继父母同意？反之，既然认为已经形成的父母子女关系不能自然解除，那么，亲生父母另一方领回子女的事实，何以又达到了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的效果？亲生父母的单方意志和行为何以能够决定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如此重大的身份行为变动，完全依赖于亲生父母另一方的意志，亦难谓妥当。可见，该观点看似全面，但不仅法律依据不足，逻辑亦难以自洽，而且可能对未成年继子女造成不利影响。

故而，对该问题的解决还应回到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性质的探讨上来，即《民法典》第 1072 条所称的已经形成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之间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能否直接推定形成拟制血亲。如上所述，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不宜直接推定双方形成拟制血亲。按此逻辑，在共同生活的生父（母）死亡时，再婚婚姻关系终止，作为附随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也应当自然解除，此时应当与《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 54 条作一体解释，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未成年继子女，如果继父（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该子女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这是作为生父母的法定义务。法律赋予选择权的应是该继父（母），而非在世的生父（母）另一方。只有在继父母自觉自愿抚养的情况下，才是对未成年子女最有利的，否则可能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即便存在另一方生父或者生母也去世、下落不明、无能力抚养等特殊情况，该继续抚养的义务也不宜强加给继父母，否则，继父母一方可能会倾向于在再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人为造成不抚养教育的事实，以免日后反倒增加负担，这实际上最终损害的是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且，即便已经形成抚养教育的事实，如果继父母不愿意继续抚养未成年继子女，强行判令继父母继续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也可能存在共同生活期间侵害未成年继子女合法权益的情况。上述特殊情况的解决办法应当是按照《民法典》第 27 条和第 32 条的规定，由其他有监护能力的人或者民政部门、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按照顺序担任监护人，而不宜直接强加给继父母。

综上，既然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依据的是抚养教育这一事实行为，那么该事实不存在时，亦不应再主张此关系。如果继父（母）与生母（父）离婚或者共同生活的生父母一方死亡，除非已经依法成立收养关系且尚未解除或者离婚后继父母仍愿意继续抚养未成年继子女（如果离婚时继子女已经成年，双方仍继续共同生活的），应当认为继父母子女关系已经解除。继父母主张共同生活期间已经付出的抚养费的，不应予以支持。但是，对于年老的继父母，可以参照收养关系解除的规定，即在继父母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成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

（本文原题为《继父母子女关系中的若干实践问题——以〈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 18 条和第 19 条为中心》，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25 年第 1 期策略栏目（第 203-213 页），原文 16000 余字，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如需引用，可参阅原文。）

家庭的双重角色及其法律界定：传统基础与当代阐释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 年第 1 期 作者：汪洋、刘冲）

家庭作为“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先于社会和国家而存在。作为法律概念的“家庭”是国家权力对既存的家庭伦理秩序的规范性描述。对“家庭”概念的界定本质上是要探寻国家权力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介入既存的家庭伦理秩序。这个问题涉及家庭的两种角色：一种是作为伦理秩序载体的家庭，另一种是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家庭。对于家庭的不同角色，国家权力在进行规范性描述时所遵循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故而是其所对应的“家庭”概念边界亦不相同。

从“伦理秩序载体”角色来看，家庭本身就是治理目的之所在。对“家庭”概念的界定实际上是要对“国家应该保护何种家庭伦理秩序”作出回答。从历史角度来看，“家庭”概念是伦理秩序和政治权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其介入家庭伦理秩序的能力也就不同，相应的“家庭”概念边界就不同。

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秩序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从“一体”的视角出发，孝作为一项道德标准可以从家庭领域进入公共领域，进而对整个社会秩序发挥结构性作用。国家对家庭伦理秩序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礼制的限制，代表统治者意志的法律在介入到家庭伦理秩序时，须符合“礼”才能获得正当性。通过对丧服制度变迁的考察可以发现，传统中国“家庭”概念是政治权力和儒家道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当代中国，“人民主权”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根基，“国家”和“人民”被直接地联系起来了，而家庭对政治共同体的构成作用则被

破除。同时，国家权力越过家庭，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于基层社会，并直接作用于个人。在国家对社会重新整合的过程中，传统家庭的生产、防卫等功能也随之消解，仅仅作为“消费共同体”而存在。相应地，家庭伦理秩序也不再是社会秩序的构成核心。在此背景下，法律对家庭伦理秩序的保护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保护”这项终极目的：一方面，家庭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基石，更是人生意义的终极答案；另一方面，人也并不总是以成熟、理性且自由的面目存在，从人的生命周期角度来看，保护家庭就是保护人启程与归航的港湾。

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家所要保护的家庭伦理秩序究竟是何种秩序？尽管家庭伦理秩序的“理想形象”是流动且多元的，但家庭伦理秩序的建构与保护从来不是一件私事，而是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首先，家庭伦理秩序的具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承担何种社会功能，以及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是否可以发挥出理想的作用。其次，从历史和人类学研究来看，家庭伦理秩序的变动，不仅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即时的影响，甚至可能跨越千年时光在根基处影响一个民族的品性。因此，国家不应以“家庭属于私域”为借口而保持中立，而是应当从社会公共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去参与建构良好的家庭伦理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文简称《宪法》）第 48、49 条对“慈”“孝”和“男女平等”等伦理秩序进行了基本的设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文简称《民法典》）第 1045、1050 条则在此基础上表达和呈现了符合《宪法》价值选择的“家庭”概念。

从“国家治理单元”角色来看，家庭因其强大伦理纽带而成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国家治理目标是多样且多变的，不同的治理目标，所

需要的治理工具亦有所差异。因此,法律在界定作为治理工具的“家庭”概念时会更加灵活,其具体边界基于不同语境下国家治理需求而确定。

在中国传统社会,考虑到疆域辽阔、人口稠密、官吏数量相对不足等因素,将权力精准、直接地作用在个体身上,准确、迅速地找到并惩罚违背规范的行为,对于古代政府而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将具有信息优势的群体设置为治理的基本单元,并要求这个群体为其内部的失范行为承担责任,可以极大地降低治理的信息成本,以非常有限的行政资源实现较为有效的社会控制。家庭便是这样一种进行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家长对于其家庭成员拥有着近乎绝对的权力,可以自行行使权威施加刑罚。因此,传统社会的法律通常将子孙的失范乱序归责于家长,在处罚上“止坐尊长”。这实际上是将家长设置成国家在家庭中的代理人,通过将“齐家”之责任法定化,来降低维持社会秩序的治理成本,实现“治国”之目的。此外,在传统社会,同居共财的家庭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共同体,人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分工,所得收益全部计入家产,同时家庭成员生活的必要消费也由家产供给。故而家庭被设置为了缴纳税赋的基本单位。考察古代律例可以发现,在借助家庭实现“提供秩序”和“征收税款”这两项治理目标时,古代政府基于治理的具体需求对“家庭”概念作了不同的界定。

在现代社会,家庭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作为社会再分配的工具。随着市场的兴起和扩张,交易秩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秩序,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则是交易秩序下人们行动的核心准则。在为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市场社会海洋中,家庭成为罕见的利他主义孤岛。由于社会中普遍

存在的“家庭本位”伦理观念以及家人之间利他主义的行为模式，国家若想要对特定群体进行福利给付，考虑到这些个体是嵌入在家庭中的，更好的办法是以家庭而非个体为单位进行福利给付。因此，尽管现代家庭不再像古代社会一样承担沉重的治安和纳税责任，但其仍然作为社会再分配的工具而继续扮演着“国家治理单元”的角色。最低生活保障、廉租住房保障等福利制度均是以家庭为单位，这些制度中“家庭”概念的地域性区别是地方治理差异的体现。由于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相差极大，各地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习俗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不可能对最低生活保障、廉租住房保障等福利制度的具体实施进行过于严格统一的要求，只能是由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治理。对“家庭”的界定作为治理的一环，自然也是因地制宜——由于各地治理的约束条件存在差异，地方政府治理思路有所不同，不同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中，“家庭”的概念边界自然也不尽相同。

在前述两种“家庭”概念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家庭”概念，即作为“防火墙”的“家庭”。基于功能而分化为诸多子系统，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家庭伦理系统内部遵循特定的伦理秩序。在家庭之外，经济系统有市场秩序，政治系统同样有自己的一套权力生成和运行秩序。系统本身具有一种扩张的倾向，而这种扩张则会导致系统之间的彼此干扰。为了避免家庭伦理秩序扩张影响政治、经济系统，也防止政治、经济系统侵蚀家庭。需要设置一系列规则作为“防火墙”。第三类“家庭”概念的意义在于，在家庭伦理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划定一条边界。例如，家庭伦理秩序的特点便是“亲疏有别”，而涉

及公共利益分配等公务时，则需要执法者做到一视同仁。因此，需要设置回避制度以避免家庭伦理秩序侵蚀公共执法的公平性。在回避制度中，便要考虑，究竟应当如何界定需要回避的“家庭成员”范围，才能保障执法人员做到不徇私情、秉公执法。

总的来说，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有三种“家庭”概念。第一种“家庭”概念与家庭的“伦理秩序载体”角色相对应，出现在调整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则中，其边界由《民法典》第 1045 条和第 1050 条界定。为了避免在传统中形成并由宪法所选择的家庭伦理秩序在一件件“个案”或者“特殊情况”中被稀释、被冲散，应禁止法院在裁判中任意改变作为伦理秩序载体的“家庭”的概念范围。第二种“家庭”概念与家庭的“国家治理单元”角色相对应，出现在调整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纵向关系的规则中。由于大量的社会治理任务都是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各部门来具体承担，应当允许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各部门基于其治理需要，灵活地界定“家庭”概念边界，而不必恪守《民法典》1045 条和 1050 条的范围。第三种“家庭”概念的意义是在家庭伦理系统 and 市场系统、政治系统之间划定一条边界，以发挥“防火墙”的作用，避免家庭伦理秩序与市场秩序、政治秩序之间的相互侵扰。此种“家庭”概念的界定同样要在不同领域，甚至不同案件中进行具体分析。

（原文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 年第 1 期“社科研究”栏目，仅代表作者本人学术观点，以上内容为文章节选，转载请注明来源。）

